

(IV) 書叢報譯日每

寫特區特北西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行發部書圖報譯

(IV) 每日譯報叢書

西北特區特寫



~~127145~~

每日譯報出版社版

1938.7.8.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5505B

117145

—物讀衆大的化代現—

譯報周刊

內容最豐富 言論最正確
售價最低廉 讀者最衆多

全年五十二期 每份五分
半年二十六期 每份五分
三個月十三期 每份五分
零售每份五分

▲定價▼

合訂本(壹卷) 上十期 業已出版

集數十家之精神 成數十萬之言巨著
是抗戰建國之指針 是精神食糧之寶庫
定價 精裝一元五角 平裝一元

上海 愛多亞路一七五號 譯報周刊社發行

西北特區特寫

目錄

頁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Nym Wales (1)
中國西北新社會……………Edgar Snow (14)

- 一 建設綱領和一般組織
- 二 怎樣動員民衆和得到他們的擁護
- 三 土地政策的理論和實踐
- 四 合作運動和文化生活

西北特區雜寫..... (三〇)

陝北文藝運動的建立.....L. Insun (三四)

一 從文藝俱樂部說起

二 中國文藝協會第一次成立大會

三 陝北文藝運動的回顧和瞻望

陝北的戲劇運動.....L. Insun (六三)

一 中國人民抗日劇社

二 西安學生的戲劇公演

三 「炭磺夫」與「祕密」的公演

編輯後記..... (九五)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

Nym Wales

延安是那流動的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這一個位置在陝北的古城，它的歷史陳蹟本來就很有趣，但當然是從來沒有像目前所遭遇的一切那麼地奇怪的。因為在延安，在這平凡的歷史過程中，正演進着一件很平凡的事——全世界第二個穩固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從事於人類社會罕見的十年苦鬥、犧牲了百萬人的生命以後，竟然爲了抗敵救國，自動地把蘇維埃名字取消了。

我現在是在延安的一間小房間裏寫這篇文章。目前，延安縣正在舉行着中國空前的第一次的民主選舉。這一個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要到十月底才結束。當所有西北各蘇區的選舉結束以後，中國的蘇維埃即將撤銷，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將改稱爲「陝甘寧三省邊區」了。

我偶然從那紙的窗格的破孔中望到天井裏，看見那位從秘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正在很小心地用手指撫摸着他新備的國民革命軍的帽子，磨擦着那青白色的琺瑯徽章。很顯然地，他是在追念着他那破碎的舊的布質的「紅星」，那是從江西長征以來他一直備帶着的。當這顆紅星破碎得不能辨認的時候，他總是自己把它補好。但是這裏已再不能看見紅星了。即使是朱德，也戴着國民革命軍的帽子。史沫特萊也一樣。整個中國紅軍現都穿着由南京發下的國民革命軍制服。紅軍的名稱也不再存在，他們已成爲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一支軍隊，中國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了。

數日前，我曾問軍事委員會的主席毛澤東：當和日軍作戰時紅軍是否把紅旗和國旗並舉。他的答覆是：「不，當我們更換了制服以後，當然也必須更換我們的旗幟。」

從表面看來，現在是無法把中國紅軍和過去的國民黨的敵軍分別出來的。他們在過去，曾在中國的一半省份中喊過蔣介石崩潰和死亡的口號，但現在却很愉快地接受了蔣的抗日命令。這是一種很有趣的政治現象。這一支十萬人左右的革命軍隊，爲謀在

中國建立蘇維埃，曾作過血的奮鬥，而奮鬥的年份已恰當蘇聯歷史的一半。十年以來，它的基本隊伍幾乎每一天都在和由國民黨制服所代表的一切東西相戰鬥，而這一種制服正是他們現在穿在身上的。這支軍隊是完全建築在軍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的；但現在正接受着共產黨的命令，在這次抗日戰爭中支持那統治階級，雖然他們的家屬大多數是被那統治階級所殺戮的。現在，這一支十萬人的軍隊，正很馴服地接受着共產黨所頒發的這一個命令，一點也不表示反抗。這種情勢怎麼會可能的呢？自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我們就不難了解這種情勢；但整個問題却在兩年以前早已決定了。當我在五月裏抵達延安時，這種變動就已迫在眉睫了。這原因是：共產黨統治人民大眾的權力是很爲鉅大的；但這一種紀律的養成，是因爲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以來，共產黨曾爲了使人民大眾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從事了極普遍的教育工作。

這是不是放棄蘇維埃的勝利呢？這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們的失敗或者是他們的一種戰略呢？延安的人們，並不抱着上述的見解；他們是以很理智的、根據事實的眼光來

觀察這一個問題的。他們接受這一種變革，是因為他們認它爲一種歷史的必然，是尚未完成的中國革命的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他們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從土地革命進至反侵略革命的階段。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可以引述被當做中國的列寧的毛澤東氏的意見。譬如，他在五月裏向共產黨大會的演說中稱：「我們擁護革命變質的理論。民主革命將變成爲社會主義。在這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包括着好幾個階段，但這些階段都是在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之下，而並不是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之下的……我們不是托洛斯基者，不是半托洛斯基者，也不是李立三主義者。我們主張「革命的變質」，而並不像托洛斯基者的所謂「不斷的革命」。我們是爲了通過民主共和國各必要階段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奮鬥着。」

有許多人認爲這一種變革是「退一步進二步」的辦法。

托洛斯基派認中國的革命是在無產階級的階段而不是資產階級的階段。他們很

強烈地指摘共產黨的和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線的政策謂：「這是小資產階級農民軍隊在欺騙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替蘇聯在中亞細亞的前線擔任着防衛工作。」

而其它托洛斯基派人士的意見却正和這相反，他們的批評是：「他們（指共產黨幹部派——譯者）早就不應該在一九二七年時企圖建立蘇維埃；至少，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時就應該放棄這一種企圖了。他們不該欺騙無產階級至這許多年。」

但是，我沒有在這裏作理論上的討論的必要，我祇是適逢其會地隨便寫一點罷了。這時，我就走進天井中去，預備去探詢一些問題。在這小小的石砌的山谷中，發着來復鎗射擊的回聲，戰鬥員們正在試射着他們的鎗械，準備到前線去服務。在牆的那邊，可聽到正在開着什麼會，或是在唱着保衛瑪德里的聲音。在我們這庭園中，組織部正在掘挖着防空地窟，以防備日機的襲擊。幾天前，曾有二架日機來偵察，隨後又來了五架。有三位孩子兵，他們是被稱做「小鬼」的，正坐在高泥堆上，像喜鵲一般喋喋不休地談着他們從四川和甘肅的家鄉出發長征時，路上碰到空襲的種種冒險經過。

有一位正在掘防空地窟的，過去是紅軍的戰鬥員——紅軍從來不用「兵士」這名稱的，——身上穿的是一條畫着米老鼠的短袴。

在這圍着大的圍牆的庭園中的一個房間門前，坐着許多從北平各大學來的避難學生，他們就都穿着日本貨的網球鞋，跑着好許多哩的路才到這裏。他們正在讀着新中華報紙上的關於上海和華北的戰事消息，這一張報在不久以前的名稱是紅色中華。自六個月以前這裏宣佈了新的政策以後，有好幾百位資產階級的非黨員青年男女都到這裏來加入曾被稱爲「紅軍大學」的「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來受訓練。我曾聽得說，在情勢改變以後，白區裏的黨員數目已激增了十倍。

對內贊同民主政治，對外從事抗日戰爭，這二點就很足以說明他們所以要放棄蘇維埃而無遺憾的原因。日本的侵略，使中國的任何一種革命感受威脅，而特別當然是對共產黨員們。同時，日本經濟陣壘的擴張，它們的勢力甚至侵入到那些古舊落後的省份裏去，在那裏，甚至像牙刷、皮鞋、鏡子、木梳，以及其它紅軍們日用的小東西和畫着米老鼠

的亞麻木襯衫等都是日本貨。原因是紅軍們對每樣東西都喜歡「摩登」。

我跑到了那位祕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的面前，中斷了他對於「紅星」的沉思。我問他對於蘇維埃的變革有什麼感想。自然，他是曉得一切的答案的。他在祕密警察局裏曾受過特殊的政治訓練。但我必須說明，這裏現在已不再有祕密警察局了，他們都已改編成保安隊，正和中國其它各地保安隊的名稱一樣。所有赤衛軍和游擊部隊也都被編入保安隊中去了。

這位護衛很謙虛地回答我說：「在目前的危機中，我們必須擁護中國的統一，以求和日本的作戰能獲得最後勝利。在這樣的時期，我們不能有二個代表不同階級的政府的存在，所以我們非放棄各種形式的蘇維埃權力不可。日本的侵略已強使國民黨恢復了革命的傾向，所以我們能夠和它合作了。」

我會把這同樣的問題問過許多人，他們的回覆都如出一轍。

當我和臨時中央蘇維埃政府的主席董必武氏談話時，曾問起他關於蘇區中民衆

的態度。他很坦白地回答說：「所有的民衆都更喜歡原來的蘇維埃，這對於他們是簡單而舒適。地主們或將更喜歡新的民主政治，但是留在這裏的地主人數很少。當我們想允許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時，發覺了相當的困難。民衆們不明白爲什麼有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的必要。農民們更擔心他們的土地會因此而重行歸還給地主。在陝北甘肅縣，就有二個區域的民衆不願給地主以投票權利，這問題至今尚未解決。但是，大體上說來，民衆們都很爽快地放棄了蘇維埃。他們信任共產黨的領導，認它所做的都是在替民衆們着想。可是，他們不能明瞭這種雜複的變革究竟有什麼必要。也有少數人不能明瞭這種變革對他們究竟有怎樣的好處。」

我也曾把這個問題問冀豫贛蘇維埃（那裏約莫仍舊有一萬多民衆）副主席鄧鳳（譯音）他的回答也差不多：「民衆們不能很清楚地了解這一種變革的必要，但他們信任共產黨的領導，並決意服從蘇維埃政府的任何決定。」

他補充着說：「我們這區裏的若干地主們已經寫信給蘇維埃政府，要求重返故居

的特許。」

在新的選舉中，除了少數因不滿十六歲、精神缺陷或犯罪者按法律不得參加外，都有普遍的選舉權。在過去蘇維埃制度內，地主和資本家們不得參加選舉，但現在却有着同樣充份的權利。各黨各派都有權公開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並為他們的政策從事宣傳，以和共產黨相競爭。但迄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其它的黨能使它自己享受這一種機會。大多數被選出的代表都是共產黨員。比如說，在延安縣的北區，被選出的一百〇九個人中，就有八十個是共產黨員，其中十五個是女的。在若干場合中，地主們為他們自己的利益組織了一種運動，但據董必武說，到目前為止，因為人民大眾們的反對，這些企圖都失敗了。選舉的方法有用舉手表示的。原來計劃採取秘密書面投票制，但因為許多人的不識字，所以無法實行。

共產黨在他們的區域裏所採取的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很特殊的。據董必武對我說：「這稍為有些像法國的代表制度，但它並不模倣任何別的國家，而祇是由於地方上的

特殊需要而自然發展起來的。事實上，這是一種新的試驗。各村落的代表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在八月裏完成。隨即由各村落選出的代表舉行區代表選舉，由區代表選舉縣代表，然後，由縣代表中選出可以參加「陝甘甯邊區」全區大會的代表。選舉的比例是：鄉，每二十個選舉者舉出一個代表；區，每五十舉一縣，每二百舉一；然後每一千五百的縣代表中選出一人參加全區大會。據董必武稱：該「陝甘寧邊區」大會至少將有五百人參加。大會將選出邊區的行政長官一人，然後由南京政府任命之。該大會有完全的立法權，為三省邊區的統治機關。

當作者寫本文時，選舉尚在進行中，預料當可於十月底結束。因為連日大雨，交通阻斷，故尚無一般數字可資統計；但據董必武的估計，在有選舉權的民衆中總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人參加投票。祇有年老的和婦女們才對新政府不大感到興趣。

在十年以前開始的中華蘇維埃的這一章史詩，就這樣結束了。「蘇維埃」的口號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南京事變以後所舉行的「第一次共產黨代表大會」中決定的。第

一個蘇維埃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成立於廣東海陸豐，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九日結束。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公社成立，但三日內即被毀。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三〇年爲止，他們專門從事於暴動和游擊戰。從一九三〇年六月至是年年底爲止，李立三的盲動政策真是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在那時期中，紅軍企圖奪獲大的城市，但沒有成功。自李立三路線被清算以後，地方蘇維埃即有迅速的發展。一九三一年成爲了割時期的一年：游擊部隊改做紅軍的正規部隊，游擊區域改做蘇維埃。自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蘇維埃選舉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舉行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這一時期中，蘇維埃權力有長足的增加。在這時候，所有蘇區裏的民衆達九百萬人，單江西一省就有二百五十萬人。

蔣介石在最初四次的大圍剿失敗以後，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圍剿時獲得了成功，強使共產黨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蘇維埃，使紅軍不得不實行向北方長征。這次長征費了一年功夫才告一段落。放棄「蘇維埃」的決定是在八月一日宣言中發表的，但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提出的談判條件。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前，聯合陣

線的運動很少發展。共產黨亟謀和國民黨及蔣介石合作；這次西安事變的得以和平解決，幾乎全靠共產黨斡旋的力量。在此以後，談判即在暗中進行，但最後的協定是直到抗日戰事發動以後才成立的。八月初，紅軍接奉命令，同正規的國家軍隊一樣，開發赴前線。為代替過去的蘇維埃政綱起見，共產黨提出了十大政綱，希望和國民黨共同合作以謀實現。

- (一) 發動全國力量決心抗日，逐出日本帝國主義至國境以外；
- (二) 停止一切對日外交談判，反對南京政府的妥協及動搖態度；
- (三) 動員全國軍隊開赴前線抗戰；
- (四) 動員全體民衆參加對日抗戰，予人民以愛國活動及武裝的自由；
- (五) 組織一容納各黨各派的國防政府，肅清漢奸並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
- (六) 建立抗日外交政策，與蘇聯締結軍事協定，並與英、美、法締結太平洋反日協定；
- (七) 採取抗日財政政策，該政策的原則為：凡有錢者都應捐助國家，日本帝國主義

的財產則一律予以沒收。同時實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經濟政策。

(八)增進並改善人民的生活，取消不合理的附加稅，減低賦稅及地租；

(九)發展抗日國防教育；

(十)以國共兩黨爲基礎組織一全國聯合陣線，以與日本抗戰。

毛澤東並對上述各點加以補充說：「這是我們抗日的政綱，我們已把這十點送交南京，請求政府與以接受。假如這十點得以實現，我們必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即趨於滅亡。」

(美·Asia 1月號)(步溪譯)

中國西北新社會

Edgar Snow

一 建設綱領和一般組織

〔一般概況〕且不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南部所曾表顯的成績如何，單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情形而論，確實可算是實行了農村社會的平等。這種情形在經濟方面表顯得最爲顯著。但是，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部門，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還不夠充份，而物質條件的種種限制更是隨處可見。在這區域裏，機器工業簡直是談不到；較之中國東部所受工業化的影響，真不可同日而語。雖然種種經濟方面的腐蝕情形，足以反映若干工業化城市的經濟變革。但在西北，主要的生產方式還是耕種和畜牧。數世紀來，它的文化都在停滯狀態中。但紅軍本身則確實是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產物。隨着紅

軍而導入的種種新思想的激刺，對於陳舊的西北文化實然是一種革命。

〔建設綱領〕由於現實環境的限制，使紅軍對初期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除了着手於政治體制的建立外，不能有所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得等他們將來能握得大城市的政權以後。因為在大城市裏，已經有着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基礎，因此可以把它們隨手取過來，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所以在目前，紅軍在西北農業區域裏面的主要活動，祇能集中努力為當前亟切的農民問題——土地和租稅——謀得解決。這政策似乎帶着反動的色彩，其實不然。中國共產黨認為土地分配政策祇是建立民衆基礎的一種步驟，目的在鼓勵民衆積極努力，以奪取政權和獲得澈底的社會主義變革的最終實現。——在這過程中，集體化將成必然的趨勢。在馬丁勞倫斯(Martin Lewenne)所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一九三四年倫敦出版)一書中，會有這樣的記載：一九三一年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對於中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工作綱領有着詳細的規定。在

那綱領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目的，是在建設真正澈底的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同時，我們必須曉得，所有蘇區裏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的組織，自始就都是臨時性質的，就是他們在江西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最要緊的是先得努力奮鬥以爭取本身的存在。所以他們的主要工作，倒不是想謀共產主義得在中國實驗，而是在努力於建立一種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基礎，使得革命事業能夠得到廣泛和深入的發展。有些人以為紅軍正在那麼一個小小的被封鎖的區域裏實驗着共產主義，這種想法實在是非常的幼稚。

〔經濟改革〕很顯然地，在蘇區裏面，紅軍的所以得到擁護，並不是因為他們抱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張，或是抱着孫中山先生所說「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紅軍所實現的最值得稱道而為農民謀福利的是下列四項：（一）土地的重新分配；（二）高利貸制度的取消；（三）苛捐雜稅的取消；和（四）特權階級的廢除。

〔階級劃分〕在理論上，蘇維埃的政府是應該同時包括工人和農民的。但事實上，差

不多全部選民都是農民，因此政治體制當然也和這種特質相適應着。當局想把農民間勢力的高下，設法使之平衡，因此把農村裏的民衆區分做下列幾種階級：（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雇農，（八）手工業勞動者，（九）流氓無產階級，以及（十）那些被視爲農村知識分子的像教師、醫生、技術人員之類的自由職業者。這種區分，一方面是政治的，一方面當然也是經濟的。他們使得在實行蘇維埃選舉時，佃農、雇農和手工業勞動者之類的勤苦大衆，比較那些富有者可推舉更多的代表。這種目的顯然是在造成某種性質的農村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但是，在那種被劃分的階級裏面，我們却很難看出他們在根性上有什麼重要區別，因爲他們都是直接和農村經濟發生關係的。

（三）選舉權利——在那些政治體制穩固的區域裏面，蘇維埃的工作很有成績。代議政府的機構是以鄉蘇維埃爲最小單位，在這上面，有着區、縣、省。以至於中央蘇維埃。每一鄉都得選舉它們的代表出席較高的蘇維埃，這樣一直到全蘇大會。十六歲以上的民衆有普

遍的選舉權，但這種選舉權是並不平等的，理由已在前面說過了。

～各種委員會～當紅軍佔領一地之後，就立刻舉行熱烈的選舉運動，隨即召開民衆大會，產生一個被稱爲革命委員會的全權委員會。這委員會和共產黨保持着密切的聯絡，並且負責辦理初選或複選工作。在每一蘇區之下，由它任命的有教育、合作、軍訓、政訓、土地、公衆衛生、游擊訓練、革命防衛、擴大紅軍、農村互助、紅軍耕種等等委員會。這類委員會，在各級地方蘇維埃以至中央蘇維埃都有。但政策的調節以及國家大計的決定，則都由中央蘇維埃主持。

～民衆組織～共產黨的民衆組織工作並不僅限於政府本身，在各鎮各鄉的農民和勞動者中，就有着廣泛的黨員。此外，並且把大多數的青年羣衆組織起來，編成「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並且把婦女大衆，也分別編制在共產青年團、抗日會、看護學校、紡織學校和婦女耕種隊等組織裏面。成年的農民則被分別編制在貧民會和各種反日團體裏面。甚至那些從來是盜匪組織的「哥老會」之類，也把他們蘇維埃化，而給以

公開和合法工作的機會。此外，像農民隊和游擊隊，都在農村政治社會組織裏面佔着重要的地位。

~黨的指導~ 上述許多組織和各種委員會的工作，都同時受着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和紅軍的指導。雖然那些團體的發起組織、徵求會員、策劃工作等，似乎都由農民本身用民主的方式加以決定，但實際上都受着黨員們的直接指導，而使各種團體相互之間保持着密切而有機的聯繫。這種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要使每一個成年男女和兒童都成爲相當的組織中的一員，而從事於被指派的固定工作。

二 怎樣動員民衆和得到他們的擁護

~春耕運動~ 蘇區裏面對於增加生產和利用荒地所取的方法和種種努力，頗見成效。我會搜集得許多由土地委員會分發到各支部去，指導它們怎樣宣傳和組織民衆，以從事於墾植工作的命令。這種命令的內容，看來廣泛得使人驚奇，却都是些合乎常識而

有實踐性的東西。我在某土地委員會的支部裏，曾看到一條關於「春耕」的命令，內容是督促那些工作人員，不取任何強迫的方式，用廣大的宣傳誘導農民們自動地來參加春耕。在早一年的冬天，當局就決定了在這春耕時期如何達到必要任務的四種詳細規劃：（一）更廣泛地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的耕田；（二）增進農作物生產；（三）使農作物時常換種耕植，特別注重於菜蔬和瓜類的換種耕植；（四）推廣棉花耕田。

「動員婦女老幼」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土地委員會所頒佈的命令中，對於如何增加勞動力量，尤其是如何使婦女們直接參加農業生產（特別是那些因參加紅軍而男子人數驟形減少之區域裏面）的辦法會有詳細的規定。其中有一段規定得頗為卓越而有趣，由此可見紅軍對於每一種有利的條件，都在儘量地利用着。這一段的規定是：

「動員所有的婦女和老幼，一起參加春耕運動。按照各人的能力，使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分別擔任繁重或輕便的工作。譬如說：天足的和年輕的女子，應該把她們組織

成各種生產教導隊，並且分別擔任清除耕田以至於農業生產的主要工作。至於纏腳的女子，以及老者和孩童，則應該使他們幫同佈種、拾糞以及其他種種輕便的輔助工作。」

「民衆的感覺」但是，農民們本身對於這種種設施有着怎樣的感覺呢？一般人總以為中國的農民是反對組織、紀律以及家庭以外的種種社會活動的。可是，假如你真要抱着這樣的念頭，紅軍們對你祇有發笑。紅軍們深信：假如農民們是在爲他們自己而不是爲了民團、地主或稅吏們在工作着，那麼誰都不會反對組織的。同時，我必得承認，凡和我交談過的農民，多半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當然，也有許多農民對於蘇維埃和紅軍很自由地作着種種的批評和指摘，但是假如問他們：「你現在過的日子是否比以前的好呢？」那麼，他們的答覆幾乎都是肯定的。是的！我並且很注意到：大多數的農民，當他們提到「蘇維埃」時，總它稱做「我們的政府。」在中國的農村裏居然有這種現象，無疑地是很使我感到驚奇的。

民衆武力。紅軍在民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礎。在那些建立較久的蘇區裏，地方上的警衛和治安的維持，幾乎全交給農民們的組織去負責。蘇區內部很少真正的紅軍，全部紅軍的戰鬥力量都在前綫。地方上的防衛工作由鄉村革命防衛團、農民赤衛團和游擊隊員分擔着。這種事實，足以說明紅軍的所以被農民大眾所擁護，因為他們並不像其他軍隊一樣把農民們當做剝削和生利的工具，他們却常是在前綫和敵人奮鬥，以博取食糧。同時農民們也都有着嚴密的組織，鞏固後方，而使紅軍得充份活動，無後顧之憂。

民衆擁護的原因。但是，我們必須深切了解，共產黨員活動的所以得到農民擁護，是有着經濟上的基礎的。西北農民過去所肩負着的像賦稅、地稅、徭役等等，現在都一概取消。紅軍到達一地，無疑地給予那些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那些赤貧的人的環境一種急劇的變革！因爲（一）在紅軍第一年佔據的區域裏面，各種賦稅全部取消，使得農民們可以透過氣來，蘇息一下。在建立較久的蘇區裏面，則對於土地徵收一種累進稅，對於商業徵收一種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單一稅；（二）其次，對於那些無地可耕的人分給

他們田地，同時把那些廣大的沒有地主或地主已經逃走的「荒地」加以開墾；（三）最後，他們把那些富有者的田地和傢俱加以沒收，而分配給那些貧窮的人。

三 土地政策的理論和實踐

「沒收和再分配」土地再分配原來是共黨的根本政策。後來，爲着政治上的策略關係，對於蘇維埃土地政策就作了極大的讓步。但當我在西北旅行時，那時實行着的土地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西北蘇維埃政府所頒佈）中規定着：凡地主和富農的田地，假如他們自己不耕種，都得一律沒收，他們所能佔有的祇是他們能用自己的勞力耕種的田地。但在事實上，西北很多地方並不感到田地的缺少；所以在那些地方，假如地主和富農們不離開他們的田地，那麼那些田地就不會被沒收，祇有那些無主的田地才被加以分配。但有時，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田地要重行劃分，使貧農們可以得到較好的田地，而地主們却祇能分配得同樣數量的劣質田地。

地主和貧農怎樣才算是一個地主呢？根據共產黨員們的定義，簡單地說：凡是不靠自己的勞力而靠租田給別人以獲得收入的農民都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那些土豪和高利貸者就都得算做地主，而應該受到同樣的待遇。根據國聯會史丹祿博士（Dr. Stampar）的調查，在過去，中國西北一帶的利金率竟至高到百分之六十，在發生災禍的時候，當然更高。在甘肅、陝西、寧夏等省的地價，大多數是非常便宜，但是一個赤手空拳的農村勞動者或是佃農，要想積蓄起錢來買進一塊足夠他家用的田地，那簡直是夢想。我在蘇區裏碰到一個農民，他過去就從來沒有能力去買進一塊田地，雖然那時有好多地方的田地只值二三塊錢一畝。

土地政策的目的除了上面所述的那些富有階級的田地要被充公外，大多數的農民當然立刻享到這種土地分配的利益。那些貧農、佃農和雇農們，都有着足夠的田地，可以維持生計。蘇區裏而似乎並沒有意思使每個人佔有同樣數量的土地。據王寇蘭（譯音）（二十九歲，俄國留學生，任西北三省蘇區土地委員。）向我說明，蘇維埃土地法

的主要目的是在使得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土地去養活他和他的家屬。而這正是農民大眾們所最亟切的要求。

〔對農民的利益〕在西北，土地問題——沒收和再分配——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因為在過去，那些大的田產都被官僚、稅吏和離開本地的地主們所佔有，現在祇要把那些地產充公，就能滿足貧農們的亟切要求了。因此，對於那些留在本地的小地主和富農們，就可不必怎樣的苛求了。所以，紅軍經濟基礎的造成，不但是由於貧窮和無地可耕的農民們因為分得了田地而擁護他們，而且在若干場合中，因為消滅了賦稅的剝削，很使富農們感激他們。更有因為上述同樣的原因或是由於反日運動的號召，甚至獲得了若干小地主的擁護。在陝西，有幾位共黨要人，他們就出身於地主的家庭。

〔特別幫助貧農〕對於貧農更給以特別的幫助，放給他們利息很低甚至不取利息的借款。高利貸制度完全取消，但私人間的借貸關係，假如年利不超過一分，是被准許的。蘇維埃政府規定的借款利息普通是五厘。當局並以兵工廠裏製造出來的好幾千農具，

以及鉅量的穀種，供給於這些無地可耕的農民，幫助他們去開墾荒地。

〔農事教育〕蘇區裏已建立了一所初級農業學校。並且據說，祇要能從上海方面請到一位專家，就預備立刻開辦一所畜牧農政學校。

四 合作運動和文化生活

〔合作運動〕蘇區裏對於合作運動的推進，非常積極。除了生產和分配的合作外，並且有着許多在中國尚屬罕見的合作方式，譬如像畜類和農具的集體應用——特別是公共農場，和紅軍農場內——及勞作互助會等組織；後者更促成許多面積廣大的田地，都能很迅速的耕種和收穫；而農民在個別勞作時的那種時間上的浪費，自然是消滅了。在農作忙碌的時期中，就採用「星期六突擊隊」的制度，這時不但是全部的兒童組織，甚至所有的蘇維埃官吏、共產黨員、赤衛軍、婦女組織以及駐在鄰近的紅軍部隊，都一致動員起來，每星期至少要有一天耕作。就連毛澤東也參加這一種工作。

〔集體努力〕紅軍就利用這一種機會，宣傳那種「集體努力」的革命思想，同時給農民們以假定「集體化」能一旦實現時所需的教育工作。同時，由於一般農民們性情的孤僻，所以就設法逐漸灌輸給他們以一種在廣泛的社會中生活的觀念。在農民中間所建立的組織，紅軍稱它們做三位一體，因為它們同時具有着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實效的三種性質。

〔文化水準〕紅軍對於提高民衆文化程度的工作，用西洋的標準來衡量，自不足觀。但是，在中國其餘部份流行着的種種非常罪惡行爲，在歷史較長的西北蘇區裏面，確實是完全消滅了。在新的蘇區裏面，大規模的宣傳運動正在民衆中間展開着，以期達到同樣的初步改革。在陝北，鴉片已完全禁絕，這尤其可以算得是極大的成就。在我走進蘇區以後，確實沒有看見過有一處種植罌粟花的。官吏的貪污事件簡直從來沒有聽得過。求乞和失業的現象，正如紅軍所宣稱的，已完全消滅。我在蘇區旅行時，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乞丐。纏腳和殺嬰，都被視爲犯罪行爲。童奴和娼妓制度不復再見。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

妻制也完全禁止。

〔結婚制度〕那種「公妻」或「婦女國有」的荒誕不經的傳說，真是毫無根據。但婚姻制度則確有改革。離婚和承繼權的規定，當然和中國任何其他部分的那些半封建法律和實際情形是極端不同的。在一九三六年再版發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 (The Marriage Law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裏面，有若干條文是非常有趣的。譬如說，姑婆虐待媳婦，賣買婦女作爲妻妾，以及父母包辦婚姻等制度，都一概禁止。婚姻必須由於雙方本人同意。法定結婚年齡：男子必須達二十歲，女子必須達十八歲。嫁奩制度，完全禁止。男女雙方假如同意，祇須向縣、市或鄉蘇維埃登記，就可不費分文，取得結婚證書。男女雙方祇須事實上已同居，不管他們有否登記過，都算做合法，他們所生的子女當然也是合法的，所謂私生子是根本沒有的。

〔離婚制度〕至於離婚，祇須任何一方對婚約不滿意而提出要求，就可不費分文取得蘇維埃登記處的許可。但是紅軍的妻子要提出離婚，那必須先得對方的同意，才能獲

得許可。至於財產，則由離婚雙方互相均分。對於子女，在法律上雙方都有贍養的義務。但假如有債務，則規定必須男子一方負擔。(一)同時，男子必須負責供給子女生活費用的三分之一。

『民衆教育』教育，在理論上說來，除了子女的衣食由父母供給外，當然是免費和普及的。但實際上，免費和普及的教育，却還不能達到怎樣的成就。據教育委員徐特立向我說：當紅軍初抵西北時，百分之九十九的民衆是文盲；但現在却已事實證明，祇要有機會給農民，他們是非常願意學習的。他們並不愚蠢，他們學習起來非常快。祇須用好的理由給他們解說，他們那種不健全的迷信的習俗，立刻就會改變。而教育本身，就當擔起這任務來。當成年的農民們，像他們的子女一樣，學完了五六百字的第一冊書以後，是不願意就此停止學習的。他們很清楚：誰在教育他們，和爲什麼教育他們？由於教育的結果，他們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鬥意識，當然是緊緊地把握住了。

(美·Pacific Affairs·十卷三號)(步溪譯)

西北特區雜寫

在西北蘇區改變爲西北特區的前夜，在選舉運動的開頭，林伯渠同志（孫逸仙的老同志，前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委員，現任西北特區主席）作如下的說明：

「最民主的制度是工農兵的代議制度。此種制度把最廣泛的工農羣衆吸引到政治生活的圈子裏來，使他們掌握政權。……然而蘇維埃制度只在中國一部份領土內得到成功。我們急需利用這部份的成功，使全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蘇區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創造一個反日的民主模範區。」

現在選舉是結束了。從前，只有工農和紅軍有選舉權。現在，所有公民，包括一切抗日軍隊裏年達十六歲的士兵，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性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只有賣國賊，漢奸，已被判決的罪犯和瘋子，沒有這種權利。此種選舉是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

在每一個地方，每二十人選出一個代表，而這些被選的代表又從自己隊伍中選出一個主席。在每一鄉裏，每五十個選民選出一個鄉代表而這些被選的代表，又從自己隊伍中選出一個鄉主席。在每一區裏，每二百人選出一個區代表，而這些被選的代表又從自己隊伍中選出一個區主席。選舉的結果，證明大多數地方當選的都是貧農，但有產階級的代表們中也有當選的。婦女們在選舉中非常活躍，在當選的代表們中，差不多百分之三十都是婦女。

當選的代表直接對他們的選民負責。如果他們不能勝任，就得撤職。每一地方組一特別委員會，當地民衆在實際工作中須與該委員會合作。地方行政跟民衆組織取得密切聯係，如商民協會、農民協會、青年聯盟、婦女協會等。在此種情形之下，盡可能地擴大民主這個原則——蘇維埃制度的首要原則，依然是特區政府和特區行政的基礎。

經濟建設，改進人民生活，加強國防，依然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任務。目前的一西北特區，一向是貧窮落後的區域，居民們向受封建地主和軍閥的壓迫與剝削，水旱兵災

的不斷蹂躪。然而牠有非常廣大的面積，純是肥沃的草場和耕地，鑛產豐富，如油鹽煤鐵等。地主和軍閥都被革命趕走了。土地分給農民，每人得到公平的一份。幾百種苛捐雜稅被廢除了，只在一種進步基礎上徵收唯一的統一稅。許多合作社成立了，有些管生產，有些管分配，有些專門供給較窮的農民以農具、種子、耕牛。本年收成非常好。許多小工業區被開發成了，許多工廠出現了。商業正在發榮滋長，商人們從遠遠的地方來此做買賣。

地主們回來找不到剝削農民大眾的機會了，政府就幫助他們自撐自立，把民衆的公地分給他們。抗日軍隊的士兵和軍官也分到土地——由當地民衆合力耕種，把收成給與戰士們的眷屬。政府又策動開發廣大的荒地。本年在膚施區內，有廣大的荒地變成耕地了。

蘇區的文化生活進步很快。以前，文盲佔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現今，三分之一的成人和三分之二的兒童都能讀書。到處有夜校。村莊的街道上設立識字牌，牌上的字句每日調換。教師們在村子裏巡迴，教民衆讀書。在成人中，婦女們比男子們更活躍，這是很

趣的事每個地方有初級小學一所內分六班。任何人都得受教育，但普遍的強迫教育還沒有。每個地方設有文化委員會，專門組織讀書班、衛生隊、軍事班、合唱隊、歌舞隊、競技隊。每區有一個俱樂部，內有劇場、歌詠班。

特區的婦女面前已展開了一種新生活。在生產部門中，在政治生活上，在軍隊裏，她們都非常活躍。由於著名女作家丁玲的號召，一個戰地服務團被組成了，跟着八路軍走。該團有演劇隊、跳舞隊、歌詠隊、看護隊等，而且還出版了一種報紙。

特區的結婚制度起了很大的變動。以前，多妻的現象非常普遍，但現今，法律嚴格地規定了一夫一妻制。結婚雖然需要很多的文件，但倒底很方便：簡單的登記，在結婚書上簽一個字，就得了。在前綫作戰的士兵和軍官的妻子不准同她們丈夫離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西北特區幾百萬人民已經創造了一個模範的民主政制。他們的戰士們正在前線實踐抗日鬥爭，而當地的民衆也站在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前列。他們的戰鬥決心，他們的建設工作，他們的活力，使他們成爲獨立、自由、愉快的新中國的先驅者。

(英·Correspondence)(羣譯)

陝北文藝運動的建立

L. Insun

一 從文藝俱樂部說起

陝北蘇區的文化與教育運動，在共產黨與教育部的領導之下，是非常活躍而猛晉的。特別是剷除文盲的工作，可以說是全中國最努力也是成績最好的一區。

但是陝北蘇區文藝運動的建立，我們不能不承認丁玲是一個奠基者或組織者。過去在江西中央蘇區時，文化及文藝方面的工作曾經創出了驚人的優異記錄，出版物的豐富與精良，就是敵對的一方面也表示非常的贊嘆的。陝北因為民智的落後和交通的阻塞，而紅軍及黨的工作者又忙於實際的和理論的鬥爭，並且爲了迫切的需要特別着重於訓練軍政幹部，（對於提高紅軍幹部及戰鬥員的政治水準與文化程度，那是無論

戰時平時都毫不放鬆的)所以文藝運動不得不暫時擱置在一旁;雖則在紅軍及蘇區工作人員中間,對於文藝有濃厚興趣的,能夠寫很好的文藝作品的人實在并不稀少。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後的發展,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正在丁玲到保安後的幾天,老王忽然對我說丁玲想組織一個文藝俱樂部那樣性質的團體,按時舉行一二次座談會或討論會,聚集一些愛好文藝的人,大家研究或習作一些文藝作品。這建議在晚上的照例的閑談中提了出來,贊成和同意的人很多;我自己并不是一個文藝家,也不會寫文藝作品,但對文學是有一些兒興趣,現在丁玲能來領導組織一個文藝團體,那當然是非常熱烈地贊成的。

丁玲開始同蘇區最高領導者們如毛澤東洛甫等談起,他們也一致的加以贊成,教育部也完全同意。徐夢秋同志更是熱心的組織者之一,他自願抽出時間來為這文藝團體擔任大部份的工作。當時丁玲老王同夢秋三人每天在討論進行的方法,組織的程序;而訂立章程和起草宣言等的工作是落在王亦民(譯音)的肩頭上。中國文藝協會在最

初創立的時候，主要的負責者就是他們三人。

但教育部曾經另外提出一個建議。因為在江西中央蘇區時曾設有一個文化委員會，所以他們希望文藝俱樂部能擴大範圍成爲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而隸屬在文化委員會的下面。他們預備將文化委員會從新建立起來，然後再來進行組織文藝團體的工作。這樣一來，在時間上不免要有更長的延遲，但丁玲願意文藝俱樂部以一個羣衆性質的文藝團體先早日成立起來。由文化委員會或教育部來領導，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同意這個主張，於是丁玲就召集了一次談話會，當天出席的人都作爲發起人，另外組織了一個七人的籌備委員會，會址便借在夢秋同志那裏。

然而我們同意教育部擴大文藝俱樂部成爲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的建議，名稱因爲衆口紛紜，決定在第一次成立大會上當衆採選。我個人的意見認爲中國文藝協會不應該只是蘇區內的一個文藝團體，而應該成爲民族統一戰綫中的一個鬥爭的手段。它除了發展和建立蘇區的文藝運動外，應極力與外面的全國文藝界取得密切的聯絡，以

爭取全國文藝界聯合戰綫的實現，在文學上推動和促進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而且要直接參加民族統一戰綫擔任自己這一方面的鬥爭任務。

發出了一篇發起緣起及召集第一次成立大會的短簡以後，便決定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某一個星期日的早上，借『白區訓練班』作爲課堂的那片院落，舉行了陝北蘇區內的第一次文藝團體的成立大會。

二 中國文藝協會第一次成立大會

晴朗的天氣，暖和的太陽，保安城外的羣山俯瞰着一片小小的院落內，中間設了一張木桌，泥地上放着或橫倒着幾條板櫪和木板。除了木桌上有具水壺和許多鐵質小飯碗外，再也沒有其他的點綴品或裝飾物。隔牆有戰馬的嘶聲傳來，它們中間有好些是身經百戰和走過二萬五千里『英雄』。這就是中國文藝協會第一次成立大會的會場。八點鐘，人就一個繼一個的來了。沒有多少時候，這小小的院落已經擠滿了。大家在

板凳或木板上隨意坐下，我們都在石階沿上『排排坐』。今天洛甫博古徐特立林伯渠吳亮平等蘇區要人都親來出席。九點鐘左右，毛澤東主席也準時到場了。他不帶衛兵地一個人坦然走來，噙着一枝香煙在門口出現，眼睛顯着疲倦未醒的神色。因為此時前方軍情正緊，紅軍連獲幾次勝利，而昨天半夜十二時左右前方又傳來一個勝利的電報：『消滅敵人二旅。』並且有個紅軍士兵的步鎗打下了一只飛機。毛澤東昨天晚上沒有睡覺，到天亮時休息了一下，而清早九點鐘就起身來準時參加這一個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大會了。

當紅軍在前方大勝的消息傳出於會場時，一陣歡呼的聲音衝破了甯靜的空氣，大家學得更高興而更愉悅。歡笑流露在每個人的臉上。這是中國文藝協會的一個吉兆。

丁玲是大會的主席，她先報告了本會組織的意義與經過，以及她個人對於本會的願望與目的。她報告時，在人羣中間的一塊空隙上走來走去，低倒了頭，臉上帶着怕陌生的紅潤，眼光有時看着她的一雙移動的腳，而四圍的一二百只眼睛都注視在她一個人

的身上。

推選臨時主席的結果，李伯釗（譯音）當選，她是從江西到陝北的三十個紅軍女性中的一個。她剛從前綫回來不久，滿面風塵之色，一套紅軍軍裝活現出她是一個紅軍女兵。她致詞的時候，雙手又在腰裏，昂頭挺胸地詞句從口中流出來，聲音提得很高，有時環顧一下四週。我們覺得自己都已變成了在聽訓的紅軍戰鬥員了。

接着是各位最高領導者們的演講。首先是毛澤東，他的演講最受人們歡迎，不但在意義上是精闢銳利，而且是非常的有味，充滿了幽默和逸趣，使聽的人往往忘記了疲倦。當天，他除了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以外，並且要求文協會員將來能上前線去在紅軍中擔任教育與文化工作。

博古主張文藝大衆化，同時提醒民間文學的可寶貴。吳亮平更引伸了此種意見。其他如林伯渠徐特立等都供獻了好多的意見與建議。他們都希望在文藝協會的推動之下，蘇區的文藝運動能夠日益的開展起來，不僅在紅軍隊伍中間，而且要在廣大的人民

羣間。

總之，蘇區的最高領導者們對於文藝運動都給與了熱誠的鼓勵和非常的注意。

在決定名稱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中國文藝協會』這個名稱，全體出席者都感到這名稱非常適合，沒有異議地當場通過了。

大會上選出了十五個負責的人物，不過其間有八個都是還在別處的，譬如成仿吾就是一例。他在定邊擔任黨校校長，但可遙領着保安中國文藝協會的負責者的名義。丁玲要將我選在這十五人之中，但我已奉命即刻要回白區去，夢秋是知道的，所以就替我抹去了。

最後，丁玲要我代表文協會員致一篇謝詞。在這班著名共產黨領袖們前面要我演講確乎生平尚是第一次，我很固執地要她『另請賢能』，其實是應該她自己致謝詞的。但她緊迫得我發窘，而且在蘇區的會議上爲了演講而推三阻四是特別的不大雅相，我終於是硬着頭皮站了起來。

在簡短的謝詞中，我同意文藝大衆化和注重民間文學的建議，同時我主張中國文藝協會，除了在蘇區內應該努力擴展和幫助文化與教育工作外，更應利用一切方法同外面的全國各地文藝界密切聯絡，把統一全國文藝界、組織文藝界聯合戰線的領導責任與組織工作擔負起來，因為全中國的文藝界直到那時爲止尚未大團結起來。總之，中國文藝協會不能僅只是一個文學工作者的或是限於文藝的團體，應是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有力的武器，而在民族抗戰的前線上也有它自己的崗位。最後，如果南京的新的「圍剿」圍到了保安，那末文藝協會就應該同紅軍的武器那樣以一支筆來實踐粉碎新的「圍剿」的工作，甚至換上槍桿直接參加戰鬥。總之，中國文藝協會也應該是一個理論的與實踐的鬥爭的集團。

餘興結束了當天的成立大會。在餘興中，李伯釗被迫着唱了二隻蠻歌，他們都聽不懂，而據她解釋這是二支情歌。她在長征中經過蠻子區域時學會了的。她并且還能跳蠻女舞，不過那天她始終沒有肯表演。我曉得丁玲會唱崑曲，於是就當衆提了出來，她在我

們的『圍剿中』萬分無奈的唱了一句，喉嚨細微得像一綫絲，唱得確乎很幽雅的，但她的窘迫情狀却也達得相當的程度了。這位經歷過多少鬥爭的女戰士，原來也有受窘的時候。最後，毛澤東講了一個笑話。時間已經中午，不得不宣告散會了。

這是蘇區內的第一次的文藝集會，而且是中國文藝界中的一個空前後的集會。一個文藝團體的集會，而有這許多著名的革命領袖們親身參加，在文藝集會的歷史中是從來不會有過的。求之於蘇區以外，那恐怕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國文藝協會自成立以後，各種具體的工作便逐漸進行起來。但是就在參加成立會後的二三小時內，我匆促的跨上了一匹馬離開保安了。十餘天後，我從正縣被迫退回保安時，丁玲已上陝甘前綫去了。文藝協會的主要責任便完全落在徐夢秋和老王二人的肩上。而這一時期的文藝協會的情形我知道的并不清楚。後來，我又遷調到離保安外五里的山中去了。因為事務上的關係，同文協更疏遠了一些。

不過，照我所知道的，丁玲是文協的主任，徐夢秋負出版和編輯的責任，老王是聯絡

部的部長。其他尚有幾個負責的人，但實際上各人因工作關係都只是負個名義而已。後來甚至連常務會議都不能召集得起來。老王本派在外交部工作，李克農關照他『外交部工作爲主，文藝協會的工作只能在有空時幹幹。』而夢秋除了政治部工作以外，還要編長征記及紅軍的政治教材，所以也忙不過來，無從專心爲文藝協會進行工作。所以實際的說來，文藝協會（自成立後）在保安時并不會能有具體的工作建立起來。

後來，丁玲從定邊來信，說已遇到成仿吾，并且已在黨校成立了一個分會。這個唯一的分會的情形怎樣，在這裏也無從報告。此外，文協在紅色中華（後改新中華）報發刊了幾期文藝副刊，是夢秋主編的。

從各處紅軍隊部中寫來詢問文協的真相和表示贊成參加的信，那倒確然是很多的。從這裏就可以知道紅色戰士的文化程度及其對於文化的注意了。

不久，西安事變突起，整個蘇區爲這偉大的歷史事件所激動了。一切人的精神與注意力都集中在這政治事變上面，文藝協會的工作不得不又暫時放置在一邊了。

三 陝北文藝運動的回顧和展望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赤色京城就從保安遷到了延安。丁玲自三原回來，文藝協會的工作便重整旗鼓日益發展起來了。

但在丁玲未回之前，文協也並不是沒有做過什麼工作的。這時的一切的事情便擔負在徐夢秋和老王二人的肩上。他們曾向西安和太原的文藝團體寄出了二封通信，開始謀得對外聯絡的實現，因為一切的環境已變得更順利了。

此時茅盾編的中國的一日已經有幾本在蘇區內出現。由於吳亮平的建議，文協便在新中華報副刊上登出了蘇區的一日的徵文啓事。夢秋特爲此事寫了一篇文章，號召一切紅軍幹部與戰鬥員，以及各地和各方面的政治工作人員，將這規定的一日內的生活寫了寄來。後來，從各處紅軍隊部中以及各地工作人員間寄來的蘇區的一日稿件，前後大約有三四十篇，其中有一部份是在延安的各部門中的人們寫的。但儘這一些稿件

而特別出一本蘇區的一日，那是太不夠的。何況內中尚不免有些沒有刊出價值的文章。所以蘇區的一日的出版計劃最後終於是放棄了，夢秋就選了一二篇優秀的登在蘇區文藝上。

丁玲到了延安，經過一度的商討，文協在人的方面便有了一些改組。重新設置了幾個部，而丁玲是無可推讓的文藝協會的主席。夢秋負總務及編輯與出版的責任，其實他在各種工作上都得擔負一些責任。而丁玲因爲下了努力發展文協的決心，所以盡力在各方面進行種種的活動。老王仍是聯絡部部长。本來附在新中華報上每星期六出一次的文藝副刊，經數度接洽的結果，決定採取單行本的形式單獨出版，定名蘇區文藝，夢秋負着編輯的責任。同時，竭力準備出一本文協月刊，由丁玲擔任主編。

丁玲叫我擔任了研究部的工作。她說文藝理論及各種創作問題的研究，在文藝的一部門中是非常需要的。過去左聯就缺少文藝理論的人才，於是就選定胡風要他在文藝理論上努力。我們現在應該更盡力的來培養文藝理論的新人才，甚至可以選定幾個

人專門在文藝理論上努力。但我不是一個文學家，也不會寫文藝創作，對於文藝理論更是只曉得一些名義，不過因為對文學尚有一些興趣，所以是熱烈的贊成中國文藝協會而參加在內，在文協的主要負責人丁玲與徐夢秋領導之下做着分派給我的工作而已。後來因為文協會員增多，事務也較前增多，但是沒有一個專人來幫助處理，丁玲擔任了警衛團的副主任，夢秋的工作很忙，所以他們就商量了將我調出來，放在文藝協會內做工作了。

文協自到延安，會員便增加了不少，而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以各地來的青年男女不下數百人，這使文協立時增添了許多新的男女會員。於是文協就印了許多會員登記表，每個會員必須填錄一紙，同時寫明自己的興趣和特長。會員的份子，以抗日大學學生佔最高的百分比。國民黨先烈廖仲愷的大兒子廖承志也是文協主要的一員，而且他和朱光二人是文協戲劇方面的負責人。

文協的會員開始依據他們各自的興趣分成了好幾組，計有文藝理論、小說、詩歌、戲

劇、唱歌、漫畫等各組。會員中參加戲劇組的很多，漫畫組也有不少人，負責的是北平木刻名家溫濤。

在文協的各小組裏面，最有成績的是戲劇組。唱歌組也曾登台表演過幾次。在漫畫方面我們本有一個很好的計劃，預備出一個漫畫展覽會。在蘇區，漫畫的題材真好似中國的地下寶藏可以取之無窮，而在畫家方面的人才也並不怎樣缺少，廖承志和朱光就是二個蘇區的名畫家。王亦明也是一個很好的畫家，他長於封面畫及摹擬畫。但溫濤的漫畫並沒有像他的木刻作品那樣的好。後來又到了一個名叫布魯的南洋青年，他的畫的確是很優秀的。布魯曾在南洋幹過多年的革命工作，在南洋坐過監牢，嚐過刑罰，被迫回到中國後，仍是一個堅決的革命工作者，雖則他甚至於做過倒冷飯的小癩三和乞丐，這種革命的精神確是值得每一個人的尊敬的。如果革命的中國真有模範青年的話，那末他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一只手的手腕是沒有的，但有許多人都沒有知道。我曾苦苦問他斷腕的原由，他始終拒絕說明，後來據丁玲說那時他在南洋的祕密工作中給炸藥炸

毀的。布魯非常不願意給人知道他的斷腕，不願意別人問，並且不願意知道的人告訴別人，現在我在此地抱歉地給他公開了。但我以為這並沒有什麼隱瞞的必要，相反的，這真是一個革命青年的光榮！

題材與人才雖不缺乏，但漫畫展覽會終於沒有能如期舉行，主要的原因也是工作太忙。後來又提出了一個計劃，要這班畫家畫各種名人像，如馬克斯列寧、史太林、高爾基、毛澤東、朱德等，拿到蘇維埃印刷局裏去石印出來，定價出售，所得除版稅外盡作文協經費的補助。在我們的預算中這票『賣買』是可以沾錢的，因為每個列甯室及講堂等全都感覺名人畫像的不夠，而且私人方面的需要也是很廣大的。然而這大批印售的計劃也沒有能完全實現，印是印了幾張，排在夢秋的外室裏而已。

其他如小說組文藝理論組等工作上沒有什麼可以記述的事情。

至於文協月刊，雖然曾抱着決心要使它出版，但因紙張印刷等事實上的難題，最後終於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創刊號的內容我們曾經約略擬妥，創作方面有丁玲的蘇區二

月，夢秋的一篇關於紅軍生活的中篇創作，同時在長征記裏可以選取一二篇，還預備請史沫特萊寫一篇東西。傳記方面有王亦明的朱德傳，或毛澤東自傳，這是美記者斯諾筆記的英文原稿。斯諾寫這第一本毛澤東自傳時，是聽毛澤東親口述說而由吳亮平譯成英文，他就一邊聽一邊紀錄下來的。留在蘇區的是鉛筆寫的原稿，他帶到外邊去的大概是複寫紙的副本，因為原稿有好些頁邊尚留着青蓮色的殘跡。在保安時，吳亮平曾交給我，要我譯成中文，我只譯了三分之一，爲了那次的奉命外出而中斷了。

其他尚有詩歌、散文。後來吳奚如到了，他也一定可以有文章供給，成仿吾也預約寫一篇。此外，再在國際文學上譯幾篇出來。這樣，創刊號如果能夠出版，在質與量上是不致於怎樣貧弱的。我們雖也有到西安去印刷出版的計劃，但終未能如願以償。

不過，單行本的蘇區文藝，每期都是很受歡迎的，內容也相當精彩，雖然仍是油印，然而封面已有插圖，那是老王設計的。

文協在延安曾舉行過幾次大規模的文藝集會。第一次是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女

士的歡迎會，同時聯帶歡迎從北平受盡辛苦而到來的那二十幾個學生。那次歡迎會是新中華社與文藝協會聯合舉行的。會場借用抗大的俱樂部，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吳亮平等都出席參加，西安委來的延安縣長也是參加的一份子。到會的人數總共約在七八十人之間，比我們的預期是超出了一倍。

這次歡迎會上，我們還備了一些茶點，不過都是十足土產的糕餅之類以及長生果等。然而我們有很好的咖啡，那是棄了教堂而去的外國教士們留給我們的。

丁玲擔任了歡迎會的主席。她說明了本次歡迎會的意義，然後由我代表文協與新中華社致了歡迎詞。史沫特萊女士，幾年前在上海時我曾在法國公園無意中見到過一面，想不到現在竟又在陝北重新見到她，歡迎她。但史沫特萊女士當然不會知道那天站在她身旁致歡迎詞的我，就是幾年前在上海無意地見過她一面的那個中國青年的。史沫特萊在歡迎會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自傳式的演講，從她幼年時代一直講到最近的生活為止。她在美國做過工人，她同一個印度革命者結過婚。她的來華是為德國某報擔

任通訊記者。九一八前她到過東三省與日本，目擊日人已在有計劃地組織瀋陽事變。她也講到當時中國政府的無能與無知，中國人民的痛苦與鬥爭。她始終是一個中國革命的同情者和幫助者。曾經爲了通訊稿件的問題同那德國報館打過一時期的筆墨官司，因爲它反對史沫特萊的態度。全世界上關於中國紅軍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就是史沫特萊在幾年前所寫的那本中國紅軍的行進。此外，她還寫了幾本關於中國的著作，其中有一本德文作品名叫中國在鬥爭中。她不但是個革命的作家，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個國際主義的革命者。她以前同丁玲也是老朋友。

史沫特萊的那天的一篇自述，就是一本很好的她的簡短的自傳，可惜會場上沒有將它速記下來。擔任史沫特萊的華英翻譯的，是燕京大學的一個姓王的學生，他是北平學生運動中的一個中堅份子，到蘇區已有較長的時期。

接着是毛澤東用『圍剿』二字發表了一篇簡短的演說。這時正在西安事變和戰未決之際，雖然他的工作很忙，但他在歡迎會上終於坐到散會才走。朱德林伯渠徐特立

吳亮平等都相繼演講。北平學生報告了一些北平的學生運動。那位延安縣長也被歡迎起來作了一篇短的演講。散會時已經天暗，這是一個興奮而愉悅的歡迎會。

不久，文協爲了歡迎從西安來的大批青年男女，也舉行過一次茶話會。他們大部份是西北救國聯合會的會員，都是西安救國運動中的活動份子，雖然其中的成分是很複雜的。成仿吾也出席參加了這次的茶話會。

後來，我們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座談會。上海及全國文藝界所喧爭很久的「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論爭，在蘇區及文協內也曾引起了一些非正式的討論。這次，丁玲要我做一篇關於聯合戰綫下的文藝運動的報告，對於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作一個決定的檢討。這時我才懊悔在未進蘇區前，爲什麼不對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作一番詳細的研究。不錯，我對這二個口號的論爭的文字稍爲看過一部份，但並沒有用心去研究他們的爭論焦點是什麼，只覺得他們衆口紛紜而且是五花八門的使人感到頭昏。但現在在文協主席的命令下，我不得不着玉來準備這一個報告。這應該感謝

丁玲的鼓勵，我才得細心研究和明瞭了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以及文藝運動在聯合戰綫中的關係，不然，恐怕我直到現在也決不會在重複研究和檢討這種種問題的。

然而最困難的問題是材料的缺乏。我所搜得的材料是幾冊文藝刊物和一本夜鶯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專號。要將全部的材料搜集攆來實在已是不可能的事情，無論你是怎樣的設法，因為這時蘇區內書籍尚在缺乏的時代。

但聯合戰綫的政治理論上的材料那却是非常豐富的而且是全部的，我將王明的幾篇聯合戰綫的名著以及毛澤東與當時蘇維埃政府的全部關於民族統一戰綫的材料，很容易的都搜集到手，這在蘇區以外倒是一件困難的事了。

第一步先將聯合戰綫的理論有系統地仔細地研究好了，然後將「國防文學」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幾篇主要文章非常注意地看了而且做了分析。漸漸地，這二個口號的論爭的全部內容都呈露在我眼前了。

在我的報告中，開首第一句我就主張文學不能同政治脫離，文學不能是超出現實

而存在着的東西。因此當前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必須同當前整個的政治局勢要完全能配合起來。因此，要判定「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那一個是最爲適宜，我們不得不拿當前的政治局勢來作爲衡量的尺度。

產生民族統一戰綫及保證其有建立可能，主要的是這三個條件：（一）日本帝國主義已由蠶食中國進而至於併吞全中國滅亡我整個民族；（二）因敵人滅國亡種的侵略的結果，國內的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新的分裂和新的結合；（三）全國人民、各黨派、各階層都覺悟到（雖然覺悟程度是不同的）非一致團結全國聯合共同抵抗日本不可，而且已經迫切地感到有這種必需。因此民族統一戰綫的最高原則，在對外方面是抵抗日本，在內部方面是全國大團結大聯合實行民族抗戰，以挽救祖國，保存民族。

因此，在聯合戰綫的陣營裏面，除了少數漢奸賣國賊以外，凡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都可參加而必須吸收進去，不論他的黨派如何立場如何以及信仰如何。所以文藝界的聯合戰綫，它的陣營也必須如此廣大，它的份子間的結合也必須如此廣泛。除了

替敵人在文藝上或文學上作漢奸行爲的人以外，不能拒絕任何一個人參加進來，而且要盡力的去吸收他們，或極力鼓勵他們走進聯合戰綫中來，不管這個作者是資本主義作風的，貴族格式的，封建色彩沈厚的或是一「鴛鴦蝴蝶派」與「哥哥妹妹派」的。但他所寫的作品內容我們必需要求它是有助於民族抗戰的。至於形式與體裁那倒是不受拘束的。

於是顯然的「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更適合於進行和建立戰綫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這個口號是太狹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項面論，標榜「大衆文學」那末非大衆的份子就已經都被關於門外，丟到聯合戰綫之外去了。民族統一戰綫不僅是要「大衆」的聯合，而且是要聯合非「大衆」的資產階級地主以及甚至軍閥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聯合戰綫或整個的聯合戰綫的陣營是這樣的廣泛，而文藝界的聯合戰綫却是如此的狹窄，那末這個聯合戰綫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這一口號在目前確是不適合的。

同時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方面，所駁斥「國防文學」論者的那些非難和指責，我在研究和分析之下，覺得大多很少有成立的根據，有許多是他們的誤解與不瞭解。就是夜鶯特刊上的胡風的那篇文章，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論者自稱爲是一篇重要文章的，也是寫得非常的籠統和含糊，我讀了幾遍仍舊沒有能在他的文章內看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這一口號的澈底的内容。最使我反對的，是龍貢公那篇東西，他簡直沒有懂得什麼叫做聯合戰綫，他在文內說聯合戰綫是「一罐漿糊」，那真是太誣蔑了聯合戰綫，同時更反映出了他對政治的無知與盲目。所以一個文藝人沒有政治上的素養與認識是不興的；至多只能成爲一個文人罷。」

舉行座談會的那天，會場是借在延安當地的小學校課堂內。人數到得很多，一間教室全給擠滿，出席者終在七八十人之間。我的報告分作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聯合戰綫論，第二部份檢討這兩個口號的論爭，最後是聯合戰綫下文藝運動的目標與任務。

丁玲是座談會的主席，她也繼之發表了一篇很長意見，她認爲這兩個口號的內

容的根本意義并無衝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在現在是不大適合。對於這一點，夢秋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見。我們幾個人在事前並未作過決定的討論。當場會員中有十幾個人發言，吳奚如和白丁（譯音）也發表了很多的意見。奚如說明這二方面在口號上的論爭，據他所知并不完全起因在這二個口號的本身，而是由別種事件引起的，他們除此以外尚有別一方面的論爭。但奚如和白丁兩人是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因為它的革命性質比較明顯。

這一次座談會並沒有能結束我們的討論，但大家的情緒和興趣都很熱烈。丁玲非常高興，於是她就召開了第二次座談會繼續討論。但她聲明，我們在這二個口號的論爭上不再太多費時間，大家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聯合戰綫中文藝運動的目標與任務上。換句話說，中國文藝協會應該發展些什麼工作和做些什麼工作。

當天，奚如仍堅持他的主張，并說「國防文學」這口號確應是作家間聯合的標幟而不是創作上的口號。他還表明要使各種主張與立場不同的文學作家在「國防文學」的

口號下聯合起來是不大可能的。白丁甚至說資產階級與地主也是大衆。這一點當場就被大家所指出是錯誤的。我對於各種各式文藝作家不能聯合的意見表示了相反的意見。我提出了這個問題：「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和各種信仰的人們既可以聯合起來建立民族統一陣綫，爲什麼文藝家便不能建立聯合戰綫？全國各黨派和各階級的矛盾與衝突比存在於文藝界的不是更要深刻和尖銳嗎？」我認爲文藝界丟開了關門主義與成見，聯合戰綫的建立是絕對可能而且是必需的。

最後，由中央局宣傳部長吳亮平做了結論。他說對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二個口號的論爭，我們同毛主席與洛甫博古等也作過一番討論，認爲在目前，「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更適合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口號，作爲一種前進的文藝集團的標幟是可以的，但用它來作爲組織全國文藝界的聯合戰綫的口號，在性質上是太狹窄了。其實，雙方都無根本的衝突。至如「國防文學」只是文藝家聯合的標幟的那種理論却是錯誤的，因爲它犯了形式與內容的不一致的錯

誤。文藝家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而在創作上却不以一國防文學一爲範圍，那是不對的。我們喊着這個口號，必須按照這個口號所規定的工作努力。在蘇區，我們喊出了一個口號，我們是決定照這個口號的內容進行工作而絕對使之實踐的。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團結禦侮，文藝運動自然必須按照這個目標進行。將來形勢更發展更前進時，文藝運動當然必須也向前發展一步。文學不能脫離政治，這句話是對的。

在決定文藝協會的今後工作的討論中，我們通過了加緊聯合全國文藝界進行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竭力發展蘇區文藝運動，建立紅軍中的文藝通訊工作等等的議案。這兩次座談會的成績是相當美滿的。

關於建立文藝界聯合戰綫，成仿吾也在某次會議上極力主張，他並且說已經寫信給上海的文藝界朋友們倡議此事。但關於這一工作的進展情形，這兒無從報告，因爲不久我就離開了陝北與中國文藝協會了。我非常希望這一工作能完全實現，而中國文藝協會應該成爲民族統一戰綫中的鬥爭的集團之一。

中國文藝協會在六個月的短促時期中，（自成立起至我離開陝北爲止）在工作上并無驚人的偉大的成績，那所無所諱言的，但它至少已爲陝北文藝運動盡了發軔的作用，奠下了一些基礎。丁玲與徐夢秋二人是費了許多心血的。吳奚如一進蘇區，就立刻成爲文協的積極的主要工作者之一。奚如不僅是個著名的中國新時代作家，而且是一個革命工作者，也是一個實際鬥爭的戰士。他的政治素養很好，他的態度是溫文儒雅的，在工作上非常努力而且負責任的。所以奚如給與一般人的影響都是極好的。他進蘇區就被任爲抗大的政治教員。

文協工作之所以不能有廣大的發展，雖然有幾種很小的阻礙，但其主要原因却在於主要負責者不能專心從事，丁玲夢秋都有別種工作牽制，奚如也不可能完全來幹文協的工作，成仿吾也是這樣。不過，文協在會員數量的增加上是很迅速的，甚至後來累得那位交際部長陳仲夫爲了調查與登記的工作，每天奔來奔去的忙了一時期。

丁玲曾以文協工作的沒有大發展引爲自己一人的咎失。在我將離陝北後，她忽然

寫了封信給我。信中希望我們不要離開延安。「文協工作的不好是我一個人的錯失，但我是抱着決心要盡力使它健全和開展起來的。你們不要聽說可以回去就欣欣然，在這裏一日就做一日工作，也就不要一日言去。」她對於我們的離去，從這封信中看來，我個人感得她是有些覺得難受和悵惘的。信裏她還重申希望我們拋棄回去的意見。這封信我是受了一些感動的。當我在臨走的一剎那時，我曾對着這封放在桌上的丁玲的信看了幾眼，很想隨身帶了它走，但是終於因為怕路上或許有檢查的麻煩而放棄了它，雖然我還想到可以作為將來寫關於丁玲的文章中的材料。（因為我在丁玲面前好幾次說過回去後，決定要寫一篇如記丁玲那樣的文字。）當然，我走了以後這封信的命運是只有拋進廢紙簍裏去了。

蘇區中國文藝協會的一般的狀況與工作，我已大概寫了一些如上，但我的只能算一篇簡略的報告，供給關心它的人們明瞭一個大概罷了。寫得更優秀和更輝煌的關於中國文藝協會的史實紀錄，那只能待陝北文藝運動的創立者丁玲或夢秋以及別的有

優秀寫作技巧的作者們來擔任，我自問沒有這種才能的。

中國文藝協會的前途，由於：（一）蘇區最高領袖們如毛澤東的非常關心與注意，以及紅軍及各部工作人員沈厚的文學興趣；（二）丁玲、夢秋、奚如等決心與努力，文藝家將更多的到臨陝北；（三）隨着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成功，整個的環境變得更為有利；所以今後決定可以有更大的發展而且有無限的光明的。

（英文·China Today）（正明譯）

陝北的戲劇運動

L. Insun

一 中國人民抗日劇社

陝北蘇區的戲劇運動，在全中國的戲劇運動中，是一種嶄新的革命的戲劇運動。在以前江西中央蘇區時代，戲劇運動的發展與活躍，在全中國是無與倫比的。那時的物質條件頗為優越，人才方面更是毫不感到缺乏。在紅色首都瑞金，他們還建立了一個可容數千人的大劇場，可惜現在已完全給毀壞了。因此你在陝北蘇區中，如果遇到從江西來的紅軍戰鬥員或工作人員，話鋒一觸及當時的戲劇運動，那末他們立時就眉飛色舞，津津樂道，吐沫往往不知不覺地濺在你的臉上。

陝北的物質條件同江西中央蘇區比較起來是差得很遠的，但人民劇社還始終的

存在着，同過去一樣的在紅軍中以活躍的姿態出現。然而江西時代的那班著名劇員已是所存寥寥了。不過它却產生和訓練成了許多陝北的戲劇人材，其中有好些是很優秀的。

一九三六年冬，我們在保安時，對於戲劇方面的欣賞機會可以說是非常冷落的。因為人民劇社始終是在前線上和紅軍中活動，或者是在農村和羣衆中間上演。我第一次看到蘇區的戲劇表演，是在保安舉行的魯迅追悼會上。那天，紅軍和各部工作人員以及紅軍大學學員都出席參加，人數終在一二千之間。毛澤東并親自出席發表了一篇演詞。對於這位革命的青年導師，蘇維埃政府給與了沉痛的追悼及崇高的哀思。那時天氣很冷，全體參加者已經在寒風中坐立了二三十小時，大會主席高聲宣佈最後有紅大的話劇上演：『紅軍大學的話劇誰都知道是精彩的，今天我們有機會欣賞了。』可是演出結果并不能使人滿意，許多人在說『沒有什麼好看。』是的，紅大的戲劇表演在蘇區內是大家聞名的，主席的介紹詞並沒有說錯，但因爲：（一）時間匆促不能有充分的排練；（二）有

許多好角色爲了工作忙碌沒有上台；自然不能獲得預期的結果了。

後來，人民劇社到了保安，這是個使人興奮的消息，大家都快樂地傳說着『有好戲看了。』在少共的支持下，保安成了第一個俱樂部，成立的那天晚上曾舉行了一次晚會，人民劇社參加了表演。但是會場太小，人太擁擠，連表演的地方也給擠得不能迴旋了。當時人民劇社也沒有演出什麼話劇，只表演了一些「活報」（「活報」是注重各種新聞故事的報道，但不用文字，而以戲劇形式出之，使人印象更能深刻。這似乎有些像化裝宣傳。——譯註）與紅色歌舞，不過那作風與格式全是嶄新的，充滿了革命的活力與青春，使人看了覺得耳目一新。那班演員雖然還都是些十餘歲的男女孩子，但他們的步法與姿勢都很熟練而自然，服飾也配合得頗美麗動人，大部以紅色爲主，但質料以布帛或紙類居多。之後，又曾舉行過幾次晚會，我因爲怕人擠，都沒去參加。

白區訓練班裏的黃直被委任爲人民劇社的主任了。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戲劇是他的特長之一。在上海他會以賣報維持生活來幹革命工作。於是我們每天在街上走過時，

常看見一隊年青的男女孩子在空地上練習或運動，那就是人民劇社在排演和訓練新的節目。他們中間有些年輕得甚至在吃飯時會互相頑皮，空閒時追來追去的遊戲。他們不僅是紅色的劇員，而且也是很優秀的紅色小戰士。雖然戲劇是他們主要的任務，但政治訓練與教育，他們也同等地有享受的權利。他們的生活與待遇是和旁人一例相同的。到了延安以後，戲劇運動就蓬勃的開展起來。廖承志和朱光是蘇區的二個演劇名角，他們雖然自一二四方面軍在陝甘大會合時就一同到了陝北，但他們戲劇活動的開始是在到了延安以後。人民劇社的社員齊集了，道具和服飾也大事增添了。但限於物質條件，只能稍為改善而已。

延安城內最好的一座建築是那天主教堂。它有一個很大的禮堂，可容六七百人，而那座鐘樓一度會成爲劇員的化裝室。禮堂內本有一坐小小的講台，人民劇社就將它改造了一下，掛起了幕布就正式成爲一個舞台了。於是，我們凡有晚會或公演便都在這個禮堂內舉行。徐特立六十大慶那天它又做了一次壽堂。後來黨或特區政府有重要的大

會或演講會時也常在此地舉行了。

人民劇社一到延安，就舉行了三天的盛大公演。並且特定一日供給延安的老百姓看。於是就使延安城的夜晚整整熱鬧了接連的三天。人是軋得不得了，我沒有獲得欣賞的機會。

中國文藝協會在保安成立後，吳亮平曾提議可同人民劇社建立聯係，特別是在劇本方面，文協會員應該多寫作一些劇本，因為劇本確乎感到不夠應用。文協自建立了劇組，同人民劇社的聯係便逐漸密切起來，而廖承志、朱光和黃直也俱是文協的會員。在創作劇本這一個工作上，朱光是做了第一個嘗試者。他寫了一本賣國賊的獨幕劇，在某次晚會上舉行了第一次的公演，由廖承志同他以及一個白區來的女性主演，但沒有獲得怎樣大的成功。第二次公演時，我們都去參加，看了以後的結論是劇本在結構上太勉強，即故事也編得不大完善，尤其那女主角是完全失敗的。但就在這一本不完善的戲劇中，大家已經認出廖承志確是一個演劇天才，朱光的表演已經不錯，但還在他之下。後來，

我在光明雜誌上看見一篇關於陝北戲劇運動的文章，那個作者說『在戲劇上最受歡迎的是廖承志朱光……』以及這個白區來的女性，但這是不確實的，作者大概是道聽塗說而已。他只演過賣國賊一劇，而她的演出是完全失敗的。但有人捧得她太過份而且不顧分寸，朱光并且替她畫了一幅彩色的『玉照』貼在延安大街的旁邊作為宣傳，戲廣告上并且稱她為『蘇區的戲劇明星』，這使好多瞭解的人不由的要感到有些『汗毛站班』。其實，這樣過份的瞎捧反而害了她，因為她竟然有些相信自己確是『戲劇明星』。而如魯迅所說那樣的『飄飄然』起來，這樣她的成功之望也不免要成為飄茫了。我知道她從沒有上過舞台或參加過表演，她能在賣國賊中首次出演，這是一種勇敢的嘗試，不論其成績好壞，終是值得稱許的事情。如果她以後能在戲劇上虛心研究和受訓練，檢查自己的缺點，學習別人的優點，我們武斷的說她絕對能成爲一個良好的戲劇人才，雖然『戲劇明星』的頭銜是不可能隨意就載到頭上來的。但她終於是沒有能更向前發展一步。

西安事變後，溫濤到了延安，立刻就被任爲人民劇社的副主任。溫濤在戲劇和歌舞方面很有一些技巧和經驗，他以前曾經領導過一個歌舞團。所以他在舞台設計與裝置、新型舞蹈的訓練與排演，以及人民劇社的劇員訓練、道具設計和方式改革上有了許多新的「進」。而他自己又是一個音樂人材，他能夠創作歌曲與配製歌譜，尤其他的口琴表演是蘇區中第一個名手。我們稱他是多才多能的藝人，他是可以受之而無愧的。

他每天在訓練人民劇社劇員們的步法與姿勢，教導他們練習新的舞蹈。他自己排在這班劇員行列的前面，領導他們學習種種舞姿，口裏是「一二左右」的喊着，腰是擺搖着或是四肢舞動着，劇員們就跟着他演習，這使他們在上演時種種方面都更成熟而更有進步了。溫濤的身材很矮小，但他在歌舞方面的新花樣却是很多的。

在蘇區，晚會是一件大家最歡迎的事件，毛澤東、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許多蘇區的重要人員，都是晚會的熱烈參加者。所以不久以後，溫濤的技能與名聲在延安城內不但是自上而下的都一致稱贊他，而且是自遠而近的都知道他。他確有成爲一個「蘇區的

藝術明星』的可能，特別是在樂劇方面。

人民劇社的活報與紅色歌舞，本來已是非常精采而最受人歡迎的，自溫濤擔任了副主任以後，它在這一方面變得更有精彩，而且幾乎每次都有新的樂劇在舞台上演出。於是人民劇社的美譽就日益開展起來了。

在話劇一方面，人民劇社也有許多優秀的人才。他們時常公演的二齣戲是放下你的鞭子和察東之夜。劇員大部是陝北的農村人民，而這二個劇本也都是以農村為主要背景。所以他們是以農民來演農村劇，在真實性這一點上實在不是別的劇員們所能夠及得到的。丁玲非常喜歡他們的表演，常說：『這是農民本色，他們的那種神氣那種姿態，都是一個真的農民的。他們是真實的、樸素的、自然的。其他的人們是演不出來的。』固然他們在表演的技巧上以及動作等等上面，是有着許多缺點或是不夠的，但這是可以訓練和指導他們而改善起來的。

人民劇社是每次晚會中的主角。晚會的舉行大都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

逢到紀念節日也必定是要舉行一次晚會的。有時爲了歡迎新來蘇區的人物，我們也會特地預備了幾次晚會。史沫特萊，外國新聞記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來的那個攝影記者，都做過蘇區晚會的參加者。史沫特萊出席唱過二次外國的革命歌，而那個攝影記者在全場熱烈的鼓掌手中，也不得不跳上台去跳了一個舞，可惜舞台面是泥地，我們除聽見了『撲撲』的舞步聲外，還吃着了一些泥灰。但他跳得很好而且仍是非常認真，下台時我看他已經有些氣喘汗流了。這個攝影記者原先在歐洲各地拍攝新聞片，西安事變突起，公司就立刻派他到遠東。他從巴黎趕到上海，再趕到了陝北蘇區，拍攝到了許多有價值的新聞影片。當天晚上，他在晚會上看見了人民劇社的活報與溫濤新排的紅色舞蹈，他高興得不得了，張開了一張嘴狂熱地拍着手掌。我坐在他附近，覺得他簡直有些得意忘形，恐怕他在看好萊塢或百老匯的最好歌舞時也不會有這樣興奮的愉悅。他回到歐美後，這次晚會的印象，夠他在親戚朋友間或什麼會上博得滿口的讚譽和當動的掌聲，而他也許可以大出風頭了。

在晚會中，除了人民劇社的表演以外，溫濤的口琴也是大受歡迎的。我們知道他會跳馬來舞，但在幾次的逼近之下，他終於不肯「獻醜」，因為舞台面太「那個」了。然而他還有一種蘇區從來沒見過的技能，那就是音樂相聲。他一個人的口裏可以奏出一班很好的西樂隊來。有銅鼓，有喇叭，還有琴聲與角聲。他口裏一會兒「咚咚咚」，一會兒「蓬蓬蓬」，接着又是「嗚嗚嗚」的，忙過不了，而他的頭既左歪右轉，他的二手二脚也是敲過不停的踏過不歇，那真是一種非常有趣而新穎的表演。結果常是引起滿場的狂熱的笑聲與掌聲，大家一致地要求「再來一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東北軍裏有個青年人到延安進了抗日大學。在某次晚會上，他自告奮勇跨上台去唱了一個小熱昏調。他用西安事變與國共合作以及民族抗戰作為題材，不但意義想得極好，聲調編得非常動聽，而且是充滿了幽默和滑稽以及諷刺的意味。全場給與了熱烈的掌聲和喝采。毛澤東也非常高興，熱烈地拍掌鼓勵他，他從台上跌下去時，毛澤東就站起來攙扶他，并且又笑嘻嘻的稱贊了他幾句。可見中國青年中天才是很多的，只是一向在惡劣的環境下被壓

抑着而已。西北救國聯合會會員王玉青聯合了小成和老陳也在台上唱過賣黎膏糖和蓮花落，也獲得了場衆的歡迎與發笑。除此以外，晚會也有人唱平劇以及跳外面流行的歌舞。這在蘇區的舞台上是可以出演的，並沒有什麼限制。紅軍中喜歡聽或唱平劇的人并不少，但唱的人只要會「哼」就終有人歡迎聽，不一定要是譚派或梅腔。甚至唱得完全不合腔調，而台下仍然會有掌聲來捧你的。延安城防司令「老邊」據說是蘇區內唱平劇的名角，逢見他在晚會中出現，人們總要強迫他站起唱一段或幾句。他是個身材肥胖高大的紅軍軍官，某次被迫的站到台上，逼緊喉嚨唱了一段花旦，戲台下的采聲當然是震動了你的耳朵的。後來西安學生在台上拉起胡琴對唱了一節武家坡，全場聽衆的喝采盛況實在不亞於余叔岩馬連良的在上海舞台的出演。最後，尚有一個曾在晚會中演出的另一個新節目，那就是丁玲的「拿手好戲」崑曲，某晚她被逼的唱了幾句。因為她替自己安排下了一個很好的計劃，她始終不唱完一節，別人多逼她一次她就多唱一句，這樣她的崑曲便可永遠唱不完，并且使人每次有「新戲」可聽。

除了延安的戲劇活動以外，蘇區各地的戲劇活動也是非常活躍的。各個紅軍隊部以及各處農民羣間，都有他們自己的劇團，或正計劃建立一個劇團。文協戲劇組曾接到幾百里外來的一封信，要求我們派人去指導他們以及供給他們劇本，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人民劇社在紅軍和羣衆中間也有了十年的活動歷史，它的戲劇不僅是戲劇，而是革命教育與政治的訓練的另一方面的表現。人民劇社的工作就是紅軍整個鬥爭中的一部份，同時，每一個人民劇社的劇員他（或她）本身就是一個革命的工作者或鬥爭者。

二 西安學生的戲劇表演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央軍顧祝同開入西京，於是在西安事變期內活躍的青年男女學生，大批的不斷地到延安來了。幾天之內就到了二三百人，他們大部份是西北救國聯合會的會員或是左傾的青年，也有少數的共產黨員或少共團員，但其中絕大多數都

是羣衆或是蘇區的所謂「非同志」。在蘇區一般人相見，無論其爲黨員或非黨員，都互相以同志稱呼，所謂「非同志」即尚非共產黨員的別稱，並不是說將他們完全當作外人看待或視他們爲「不是同志」。如果作這樣解釋那就大錯了。

在這一羣從西安來的人們之間，有二三十個是女學生，他們也全都是西安婦女救國會中的份子。當然在這二三百人的裏面，純潔的愛國青年或革命青年佔着絕大多數，但也不免有少數背景曖昧或身世複雜的份子。以階級的成份上看來，可以說全部是同一樣的小資產階級，至多是革命的知識份子。甚至有一二個只是憑一時情感上的衝動或是僅祇爲了戀愛問題就此往蘇區一走，使他們的家庭再也無從阻礙他們。但澈底執行民族統一戰線的蘇區政府一律收羅他們而訓練他們，不管他們的黨派與信仰如何，只要他們不是漢奸賣國賊。

抗大另闢了一部專門教育他們，依照他們的程度分了許多組，他們大部份是中學生，有的還只有高小程度。不過他們中間的戲劇人才很多，有好幾個都是西安的話劇明

星。西安事變期內，他們在戲劇上是非常活躍的。於是他們幾乎全部的成爲了文協的會員，文協的會員立時增添了不少。爲了登記，爲了調查他們在戲劇上的經驗與經歷，交際部長陳仲夫成了一個忙人。

這時延安的晚會正是鬧得鬧熱，而話劇公演也正是在活躍的時候，於是他們也在蘇區晚會中首次的參加了表演。他們自己配好了一個演員隊，選定了劇本，預演了一個時期。他們自選的劇本是平地登天與中華母親二劇，這是他們在西安等地歷次演出而且受到過盛大歡迎的。據說，尤其是中華母親一劇，是最出名的劇本之一。

是的，他們的人材是相當整齊，表現的經驗與技巧也是很好的。平地登天一劇是一個諷刺短劇，它所諷刺的正是那時鬧得烏煙瘴氣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醜態。它在暴露與諷刺官僚與劣紳的勾結和賄買選民，以及一班公務員窮時受盡老婆瘟氣稍得志時便驕氣凌人的那種種衆生相，是獲得了成功的。在演出上，演員方面的成績也是獲得許多贊美的。尤其那個女主角，表演一個潑辣而尖酸的婆娘，可以說是獲得完全的成功。

她是一個經驗與技巧都已達到好處的戲劇人才。毛澤東朱德看了這個劇本也給引得發笑不已。而且他們完全用陝西土話作爲說白，這在戲劇上也是一種新的成功。

但當中華母親演畢時，這劇本的意義及其所包含的有毒害的意識使得一般人引起了反感。全劇的故事是一個年青時代以革命同志和他的丈夫結合起來的母親，憤恨於他丈夫現在竟變成了漢奸，替敵人在東三省作破壞義勇軍殺害愛國志士的無恥工作。但他的幾個兒女都是祕密的愛國團的團員，團中命令他們殺死他們的漢奸的父親。兒子不忍殺父，姊姊鼓勵他，竊聽的母親於是走出來極力表示贊成，於是傾着毒藥的一碗補品，那個做漢奸的父親就從這位中華母親的手裏拿去，而當場倒斃在地上了。最後這位中華母親便以一篇激昂的演說結束了全劇。

這劇本的故事是非常勉強的，而全劇着重在殺死一個漢奸的父親，在另一方面是放鬆了主要的敵人。何況對於一個漢奸的父親不必一定要兒子與母親來毒死他，根本對付漢奸也不是毒殺的手殺所能奏效的。漢奸與賣國賊確乎可殺，但有廣大羣衆的革

命鬥爭可以作爲最有力的武器。在這劇中使人容易發生只是一個妻子殺了丈夫，兒子殺了父親的簡單的故事，雖則這父親或丈夫是個漢奸。當場抗大的校長林彪在人羣中間站了起來，他發表了一篇簡短而有力的演說。他嚴正地指出這個劇本的意義是完全錯誤的，並且指出了它的誤錯點何在，希望全體在場的人員不要感染到了它的影響。『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中，并不需要一個妻子去殺丈夫，兒女去殺父親。我們極力反對這種意識與傾向。這對民族統一戰線只會發生害處而不能發能有益的作用。』全場用一致的熱烈的掌聲表示出了林彪的意見就是大家認爲非常正確的意見。散會時，我聽見紅軍總司令朱德說：『這錯誤是很嚴重的，它是小資產階級瘋狂心理的表現。』丁玲提供了許多反對和批評的意見。夢秋說：『真糟糕。它的名稱還叫做中華母親，這樣的「中華母親」我們是不需要的。』我稱他爲「天才」的廖承志也大搖其腦袋了。於是就產生了一種意見，以後對於一切劇本在公演之前必須先審查一下，而中華母親在排演時竟然誰都沒有去參觀，即在負責方面是太疏忽了一些。是的，他們大部是

文協會員，雖然他們此次并不是文協的公演。而我們因為聽說中華母親在西安等地救國運動中已經演出多次，而且據說是非常受到歡迎，因此我們以為它終是一個很好的劇本，至少是不致於壞到怎樣的，而結果却是壞到這個樣子，實非我們始料所及。所以在蘇區以外盛行的劇本，不必說像中華母親這種壞劇本，便是被稱為革命的劇本，到蘇區來上演，也是非常不夠的。爲了劇本的缺少，我們翻過外面的有名的劇本（當然是革命性的），沒有找到一篇是適合的。在外邊看來這劇本革命之至，從蘇區的眼光那是同革命相去還很遠哩。

後來，他們又公演了二個劇本，也都是失敗的。這失敗并不在於他們的表演與技巧，而完全在劇本上面。於此使人更感到人民劇社的優點來，它的演員們的技巧與經驗雖是不及他們，但在革命性上却遠非他們所能及得到的。不過，西安學生們最後公演的那齣撤退趙家莊，我們應該承認是得到成功的。這是豐台事變後著名於平津及華北一帶的優秀劇本，它以廿九軍與在豐台抵抗日軍作爲題材，漢奸賣國賊在投降敵人的無恥

出賣外，廿九軍被迫奉命撤開豐台，遠到趙家莊，受傷的連長還被上級革職。全劇充滿了悲壯憤慨的情調，激起了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它是國防文學中的一個很好的國防戲劇。

他們的女學生陣營中曾經組織了一個十餘人的唱歌隊，在舞台上唱了一支歡送抗日軍上前線的國防歌曲，這是西北救國聯合會爲歡迎和慰勞由東北軍與西北軍組成的抗日聯軍，在潼關以及前線上鼓勵他們的。這班從西安來的女生，以西安助產學校及女子師範的學生佔居多數，助產及女師在西安的學校裏面是最熱心於救國工作的。她們中間有二個女生，我們記得曾在西安看見了過她們。一九三二年十月，我們困居西安，悶得發慌。忽然在報上看見西安學生各種賽球決賽的新聞。在運動場中我們看到了助產與女師的排球決賽，其中有二個人最引起我們的注意。一個黑胖的排球拍得很好，另一個老陳稱贊她是『苗條而漂亮。』所以當老陳去要他們填文協會表時，回來就說在她們中間發現了幾個在西安看見過的人，而由於革命的力量，她們現在也給帶到

延安來了。

而當我們將要離開延安時，文協在他們中間成立了一個分會，這是由於學校當局的建議，而學校當局是爲了他們的功課和紀律的關係，因爲其中有好幾個男女常借文協開會或排演戲劇爲名請假離校出外。這種情形以紅軍幹部爲主要學員的那個舊抗大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革命非常着重於階級的成份。

三 「炭礦夫」與「祕密」的公演

文協在當時的延安戲劇運動中也是參加者和活動者之一。戲劇組便是專門擔任戲劇一方面的工作的，領導者是廖承志和朱光二人，曾經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同人民劇社中是有聯絡的。溫濤和黃直就是文協的會員，而文協戲劇組也就是人民劇社的一部份。

文協戲劇組第一次的公演是炭礦夫。這是一個著名的日本劇本，描寫日本礦工生活的痛苦與資本家壓迫的慘酷，以及由礦山爆發而激起的礦工工人大罷工的鬥爭。它是一個充滿了革命鬥爭的劇本。廖朱二人以前曾經公演過這個劇本。雖然劇本已經遺失，但情節方面他們二人尚大部份記得，於是他們就重新編寫了出來，不過將題材轉作東三省礦工反抗日本軍閥與資本家們的鬥爭罷了。

因為每次的公演，劇場內總是弄得非常秩序紊亂，於是我們不但印發入場券，而且派定了收票及幫助警衛團守門的人員，還指定了在會場內招待的人。文協的公演確乎也轟動了許多人，維持秩序的人終於不得不關上了外邊的大門，同時嚴厲地執行命令，沒有門券的不放入內。因為會場實在大小，不有組織地來維持秩序，結果將使會場內妨礙舞台的表演，而且使得大家不能靜心看戲。那天晚上我們雖弄得聲嘶力竭汗流浹背，但會場秩序終算維持了下去。白區部主任張浩要從邊門過來，警衛團堅執不允，因為他們執行「邊門只有舞台人員可以進出」的命令。湊巧我要打從邊門進入舞台，但我也

不能夠徇情放他進去，他拿出了忘記了的入場券，警衛團說可從那邊大門進去。張浩說那邊實在擠不進去，於是警衛團才讓我伴他走進了劇場。

在炭礦夫一劇中，周恩來的夫人鄧小超也參加擔任了一個角色，廖承志飾老礦工，朱光飾了他的兒子。他們都獲得了驚人的收獲。當礦山爆發，兒子救同伴傷命，屍身抬到舞台上時，罷工已在進行，這老礦工便做了英勇的領導者，全劇是達到了激昂與鬥爭的高潮。我們這批不會演戲的傢伙，都在幕後做着罷工羣衆的呼聲和脚步，鐵板銅片叮噠的響着。台下是一片靜默，千百只眼睛都盯在舞台上。在非常滿意的成功中，布幕掩去了炭礦夫的最後的一場。

廖承志和朱光得到了許多的好評，其他的配角大部份是那批北平來的學生們擔任的，替史沫特萊做譯員的那個王汝梅也是劇中的一個角色。在公衆的批評下，炭礦夫的公演證明是成功的。它在後來又表演了幾次。

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延安城內將有一次盛大的晚會。文協預備在這次晚會中舉行

二次公演，但是沒有好的劇本。丁玲計劃將胡也頻六人被殺的故事編成一個劇本。那天晚上，丁玲同我在老王的宿舍裏商討此事，三個人將前後情節及分幕都想好了，決定由丁玲動手編寫出來，但後來她又放棄了。在這劇中，丁玲將在丁玲探監的一幕中自飾丁玲上台，而胡也頻等的被殺就是在三月之初。

這時我在莫斯科出版的國際文學上譯出了一個劇本，那是關於西班牙工人的革命鬥爭的，是一篇寫得非常精彩而有力的獨幕劇。起初，因為文協月刊需要稿件，我是譯出來預備作為創刊號內容之一的，劇名是祕密。後來別人在北平清華大學出版的文藝刊物上發現已經刊出，雖然是有些刪節。我完全譯出以後，丁玲、夢秋和廖承志等讀了都同聲說是好劇本，於是我們就決定要拿它來公演。丁玲的意見是很對的，她說：「這是一個極好的劇本，但非常難演而且不容易演得好。因為它的人物和劇情非常簡單，完全要靠劇員的表演來締造它演出的成功。用這劇本來訓練演員那是最好沒有的事。」既然大家都贊成這個劇本，於是就決定將它拿到舞台上公演。

吳亮平的意見想把故事改作東三省義勇軍的鬥爭，但最後廖承志說不必改編，我們就拿它來紀念西班牙工人的英勇的鬥爭，反映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及全體西班牙人民抵抗叛軍佛朗哥與國際法西斯主義的、現在正在進行着的偉大的階級的與民族的革命戰爭。

故事是非常的簡單，人物也一共只有五人，而背景始終是在一個警察祕室裏。幕開時，陰險而狡猾的警長在審訊一個工人，因為工人已經決定在晚上實行總罷工，他要這個英勇的工人招出他們的祕密軍械庫來。工人在獄中每天吃的是鹹魚和撒了鹽的麪包，所以口渴得要死，警長的面前就放了一瓶甜美的清水，他用清水誘引工人招供，幾次的將水倒在杯裏又傾進壺裏，甚至故意倒在他的面前的地上。因為工人堅決的不吐一辭，警長就暫時離室。另一個已經半瘋了的工人走進祕密室來，因為他被強迫吞了毒藥，所以神經已非常錯亂，他將要說出只有他們二人知道而亟為警長所急需知道的「祕密」來。警長入室，他要求將這半瘋的同伴牽去；在一種巧妙的做作中，他騙信了警長，

說是願意招供。他喝到了清水，他爲自己做了叛徒而痛哭，最後他要求將那個半瘋的伙伴鎗斃，因爲這樣就可滅去了見證而苟延他自己的性命，不致爲其他的同伴所處死。正當那半瘋的伙伴鎗斃了的時候，他突然瘋狂地大笑了起來，他英勇地衝着警長大喊：『祕密，這祕密，只有他知道我知道，現在他死了，你已永遠不能得到這個祕密了。鎗斃我，鎗斃我！』受騙的警長羞憤交併跳起來拔出了手鎗，突然電燈暗了，二個警察氣急敗壞地奔進來報告。工人已經發動了總罷工，電燈自來水也已完全割斷，大隊工人的武裝暴動終於開始了。這時外面的街上傳來了暴動的吶喊聲，警察在用手鎗抵住了那工人的緊張而激動的場面中，幕倏然的下來了。

在這個劇本中，警長是一個非常難演的反派角色，而那工人却是一個英勇而又精細的革命戰士。那個半瘋的工人同樣是非常的難演，他一面已經神經錯亂，但必須極力演出他滿腔的悲憤與苦痛來。二個警察倒是比較容易演的。這劇本如果演得好，那是可以獲得非常的成功；萬一演得不好，那便是可慘地的一敗塗地。而全部的成功是完全建

在演員們的表演之上的。

離開公演已只有一星期了，而我們除了劇本以外，什麼都沒有預備好。當第一次預備的時候，廖承志的警長和朱光的工人以及王汝梅的半瘋工人，參觀預演的人們看他們演了一段都搖頭說不興，小成甚至反對這劇的實行公演。他的理由是劇本難演，演員難找，連廖朱二人都不能勝任愉快，同時時間非常侷促，已沒有餘暇排演。最後他竟對我說：『如果此劇能演得成功，我給你們打二記耳光。』

這樣，廖朱二人也覺得興味索然，其他的人們也感到與其演不好不妨就停止不演。於是祕密的公演一時幾乎成了泡影。但我個人的意見，廖承志是個演劇的全才，他完全可以擔任警長這一個反派角色。朱光的外表可以化裝成一個工人，他的個性適合於演激昂的角色，同時他有過長期坐牢的經驗，他懂得一個革命者在受苦難時的心理與表現。同時，廖承志也說得好：『奸惡的暴徒們審訊政治犯以及牢獄的情形，我們都完全懂得，而且是非常親切的。』因為廖承志有過這種經歷，他在上海曾落在馬紹武手裏受過

一度犯人生活。至於半瘋工人的那個角色，王玉青自告奮勇願意一試，雖然他從來沒有登台表演過。王汝梅與黃直擔任演二個警察。

於是排演又重新開始起來，然而時間更迫近了。我們——小成、老陳、小汪和我以及黃直等——都做了大導演。除黃直以外，我們既不是戲劇家，更不是導演家，做個演員尚不可能，那裏有導演的力量，但我們畢竟擔任了下來。我們這批寶貝做導演，只有在蘇區才有可能。其實我們無非是盡了些「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作用而已。

白天大家都沒有空，所以每天晚上我們都弄到午夜或一點鐘才睡。但大家的精神都非常的興奮，情緒也是非常的好。第二次的排演進步了不少，可是他們只一段段的排演了幾次，始終沒有自始至終的排演過一次，因為時間已經不許可這樣做，第二天晚上就要公演了。

延安城從來不會有過電燈，而我們的舞台上總算有了二三盞汽油燈。但秘密最末是需要關電燈的，於是我們就用黑布罩套在汽油燈上面用線攀住了。如果關電燈就將

線放了下來，開電燈就收了上去。蘇區的物質條件對戲劇是給與了很多的困難，但在蘇區裏面的人們，發明家和創作家也是非常多的，在無論怎樣的沒辦法中，我們終有『極法子』可想，有時竟是非常巧妙的。

在全場參加者的熱烈的和緊張的期待下，秘密公演了。我被派定替朱光在幕後提示，（幕後提示是戲劇上最忌的一個缺點，但在我們是應該要加以原諒的，誰能有這麼許多時間去讀熟對白呢？）所以我自己沒有能看到公演的成績怎樣，雖然我是非常熱切地盼望看到全劇的進行。我當時在幕後所能知道的是全場寂靜無聲，舞台已經吸住了全場的參加者。

全劇演到最後時，我才有專心看舞台上的劇情進行的機會。這時全場更寂靜了，幾乎連一聲咳嗽都沒有。朱光激昂地悲憤地但是歇司的里亞地衝着廖承志大喊廖承志羞憤地握着手鎗，突然電燈暗了（應該說汽油燈上的黑罩落下來了），二個警察慌張而氣喘地奔了進來：『總罷工開始了。』幕後喊出了罷工和暴動的吶喊。這時，指揮笛已

經吹了起來，幕已應該立刻掩上，但那二個拉幕的警衛團士兵不知是否已看出了神，竟拉着幕不動。這真是一個意外的不幸，全劇的緊張局面要破壞了。幸而廖承志和朱光及幕後的人都補救得好；廖承志繼續怒罵朱光，朱光也更激昂的大喊『鎗斃我！』『哈哈！哈哈！』我們都急得不得了，我看出台上的四個人更比我們着急，但又不能放下表演，仍舊在裝作着聲勢。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幸而有人從旁跳出來急速的拉幕，那二個拉幕者才飛一樣的拉上了幕。

台上的人才透出了一口氣，大家不但埋怨拉幕的人，而且在擔心全劇已經遭到了不可挽救的誤延。幕外立時震起了前所未有的熱烈的掌聲，寂靜了一二小時的全場即刻沸騰和熱烈起來了。我們聽到了一片贊美的聲息。

跳下台去，博古、朱德望着我們嘻嘻的笑，可以知道今天晚上他們都很滿意。遇到了玲和夢秋，他們說今天是演得成功的，全場都已表示滿意。我們的一顆心才算落了下來。全劇演得最好的是廖承志和朱光。前者在劇中還另外補救了一個不幸；朱光脫脚

上錄鏄時，給他載上的人縛得太『仔細』了，他解來解去的一時解不開來，廖承志在表演中就插着說：『不要心急，慢慢的解好了。……解好了沒有？……水替你倒在這裏了：』這在劇中是沒有的。然而若不是這位警長有『急智』，不免就要使全劇加上一個小破綻，因為朱光已經解得有些火冒起來了。王玉青從來沒有演過話劇，直待聽到了丁玲『你是成功的，演得不錯』才使自己獲得了寬慰。這個半瘋工人的角色確也是不容易演的。黃直與王汝梅的警察也獲得了同等的稱美。

後來有人對我說：『毛澤東昨晚上看秘密時，眼淚都淌出來的。』我不由得呆了。下：『爲什麼？』『因爲他看到那個工人渴得要死而幾次喝不得水的痛苦，所以感動得下淚了。你看，這不是極痛苦的嗎？』朱光那晚演的工人的成功，我們在這一段插曲中就可知道了。

同時，有許多人當時恨極了廖承志，因爲他的天才將那個警長演得至於使人發生了憤恨，他當晚沒有吃到磚頭和泥塊，我到現在尙爲他慶幸不止哩！

大部份看過秘密的人們都說：『演到最後時，我們的一顆心和呼吸幾乎都完全停止下來了。我們都忘記了自己。』

又有人告訴我說：毛澤東看了秘密後，碰到廖承志就說，你們好好的努力，多排些好的新戲出來，讓我們可以多看幾本好戲。你們要用多少錢，要用什麼東西，可以開預算表給我，叫他們去辦。

靠了這五個演員的表演能力，秘密終算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如果秘密的原著者，知道他的劇本在中國蘇區中獲得了成功的演出和這樣普遍的讚美，我想他也一定是非常的高興而引爲自己的一種最可寶貴的光榮的吧！

×

×

×

×

三月八日的婦女節，本已預定再有一次盛大的公演，但我們三人已經離開延安了。汽車開出延安南城時，我是第一次感到無限的依戀與惜別。是的，我知道了玲願意我留在延安，不要回去，因爲她曾經有過一個建議：組織一個流動的團體，在紅軍及各地

農村中從事文化與政治工作。我臨走前一二天，她還從史沫特萊那裏借到了一本英文的日本小說要我翻譯：『這是一本日本的革命小說。』但最後她終於說不挽留我們，而夢秋也同意我出去也好。是的，我願意到外邊來看一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整個中國的局勢，看它已經有了什麼發展和怎麼樣的變動。

『我們在外邊，不會忘記你們在陝北吃小米飯的。』這是我說的一句話。我是願意而且是可能再回到陝北來的。車子出延安城門時我就這樣想着。

現在，果然有朋友們帶來了丁玲組織戰地服務團隨八路軍出發抗日的消息。平津雖非我有，可是這隻中國猛獅已經奮爪豎尾地預備起來作最勇猛的鬥爭了。

民族抗戰的砲聲響了，全國的人民起來了，我摺起了那條在陝北伴過我半年的灰色軍毯，它已再一次的掛在我的肩頭上了。

幾天後，我就要重投進陝北羣山的懷抱中來，而且要再一次跨過那條蜿蜒的洛水，我將可以向羣山與洛水喊一聲別來無恙了。

中國青年！偉大的民族革命需要你們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們大家來高唱：『噯！用我們的刺刀鎗炮頭顱和熱血，堅決與敵作死戰！用我們的刺刀鎗炮頭顱和熱血，堅決與敵作死戰。』

一九三七年秋天於北平郊外某村中

(英文·China Today) (正明譯)

編輯後記

關於記述西北特區的文字，現在已有很多，但這裡所收集的五篇，大都是外間未見的作品。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一文，是 Nym Wales 女士（斯諾夫人）本年由西北特區出來後，在美國亞細亞雜誌上發表的，就我們所見到的而論，這是記述西北特區文字中最富於時間性的一篇。至於前蘇區的文學戲劇運動的詳情，到現在還沒有系統的記述，本集所收兩篇，很值得參攷。作者本人就是前蘇區的一個文化工作者，所以所寫的當然比較翔實和深刻。

西北新社會原文曾分期登在譯報上，不久之後，市場上即出現一本題為中國的紅區的小書，其譯文與本報所發表的竟完全相同。現在本書所收的，已經過原譯者的詳細訂正。因為這篇文章很有分量，對於前蘇區的實況敘述頗為詳盡。作者斯諾（Edgar Snow），讀者想必都非常熟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505B

毛澤東新著兩種

請

讀

譯報時論叢刊

欲對中國抗戰有真確的認識

論新階級

每冊售價
一角五分



論持久戰

每冊售價
一角二分

譯報圖書部發行

愛多亞路一七號 電話八五八七五號

行發

譯報

日每



種四第書叢

寫特區特北西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發行者：
英商每日譯報社圖書部

發行人：
拿孫特
門司 · 裴
鮑士

編譯者：
每日譯報社編輯部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六分

廿八年三月十五日三版

Mei Kh J-Bao

(The News Digest)

Published daily by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17 Av. Edward VII, Shanghai.

Directors: J. A. E. SANDERS-BATES, N. E. BONNER.
Tel. Nos. 85875 & 18802. Cables: "Scholaris."

日一廿月一年七廿國民於刊創報本

納鮑 · 門拿 士裴 · 司特孫人行發

精製

（印章）

（印章）



（印章）

（印章）